

上海律协婚姻家事专业委员会

法律资讯

婚姻家事与私人财富管理



2024

第03期



主任：吴卫义

副主任：（按姓氏拼音）

付忠文

桂芳芳

吴 琼

编委：（按姓氏拼音）

陈芸

陈雁

顾继云

高明月

彭梅芊

翟雯婕

沈奇艳

王晨

吴琼

邬晓嫣

徐丹

许慧芳

杨燕亭

张焕娥

赵薇薇

张玮颖

执行编辑：许慧芳

目 录

→ 行业动态

1、家暴，不止这 100 多位，如何反？

（来源：上海一中法院 2024 年 3 月 6 日 作者：夏天 范诗瑶 叶建荣）·····4

2、四十不惑，少年审判再启新程

（来源：人民法院报 2024 年 3 月 14 日 记者：孙航）·····7

3、全国人大代表杨宝玲、冉慧、唐利军谈离婚后抚养权、探望权的执行——依法督促父母履行责任 多效并举撑起“法治蓝天”

（来源：人民法院报 2024 年 3 月 15 日 记者：何雨潇）·····21

4、登门入户调解遗产纠纷，《法院里的“枫桥”》让兄弟和好如初

（来源：最高人民法院微信公众号 2024 年 3 月 17 日 编辑：邢天然）·····24

→ 媒体聚焦

1、【新华社】高法报告提出遏制高额彩礼引发共鸣

（来源：最高人民法院微信公众号 2024 年 3 月 10 日 记者：鲁畅 潘德鑫 陈诺）·····30

2、法答网精选问答（第三批）节选

（来源：人民法院报 2024 年 3 月 21 日 责任编辑：刘强）·····33

3、全国首例！家暴男无视人身安全保护令被追究刑责！

（来源：香洲法院微信公众号 2024 年 3 月 20 日 撰稿：香法宣）·····35

→ 案例评析

1、孤寡老人遗产管理人案牵出“人间佳话”

（来源：法制日报 2024 年 3 月 9 日 记者：丁国锋）·····38

2、最高院：夫妻一方频繁转账给另一方，并不能就转款原因和款项性质作出合理解释的，应认定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

（来源：最高裁判解读微信公众号 2024 年 3 月 25 日）·····45

➡ 裁判实务

1、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涉未成年人食品安全司法保护典型案例四例

（来源：最高人民法院微信公众号 2024 年 3 月 15 日 编辑：平钰骁） ····· 47

2、继承人曾口头表示放弃遗产后又起诉要求继承，如何认定？

（来源：上海宝山法院微信公众号 2024 年 3 月 18 日 作者：民事审判庭 周聆敏） ····· 55

3、2023 年度江苏法院家事纠纷典型案例十例

（来源：江苏高院微信公众号 2024 年 03 月 07 日） ····· 58

➡ 业务研究

1、 遗产管理人制度的程序建构：如何指定与为何指定？ ——基于实体与程序交互实质性促进理论框架

（来源：《经贸法律评论》2024 年第 1 期 P59-72 作者：赵蕾） ····· 73

2、 扶养义务的“激活” 与“过去时间的扶养费”的有限可追索性

（来源：《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24 年第 1 期 2024 年 03 月 15 日 作者：徐国栋） ····· 96

行业动态

家暴，不止这 100 多位，如何反？

上海一中法院 2024-03-06 作者：夏天 范诗瑶 叶建荣

一直以来，上海法院持续探索实施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反家庭暴力提供了有益保障。但由于市妇联等相关部门此前无法第一时间获取法院涉家暴案件信息，使保护令的效能受到一定影响。如何通过数字改革赋能，走好这项制度的“最后一公里”？

在“三·八”国际妇女节即将到来之际，上海法院“涉家暴信息沟通共享机制”应用场景正式推广。该场景由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嘉定区人民法院）合作开发，致力于打破信息壁垒、汇集社会合力，共筑“司法+”多重反家暴“保护墙”。

“《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修订后，人身安全保护令的适用范围得以进一步延伸。”嘉定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法官秦春辉对这样一则案例记忆犹新，“一位女性在与丈夫协商离婚过程中，多次遭受来自丈夫的家庭暴力。公安机关对男方采取了警告、训诫，但家庭暴力仍反复持续，对女方的身心造成了巨大伤害。”

法院收到女方申请后，迅速查明相关事实，及时开具人身安全保护令，禁止男方对女方实施家庭暴力等行为，并明确了相关法律后果。

“人身安全保护令作为一种干预性手段，想要打通执行关卡，让它真正发挥实效，少不了多部门的协调配合。”嘉定区人民法院嘉中人民法庭庭长郑志强说。

一直以来，上海法院持续探索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的有效实施，尝试通过区域联动的做法，破解人身安全保护令执行难的问题。

此时正值上海法院以场景建设、数字建模为重点，大力推进数字法院建设。其中，

“数助决策”是一个重要板块。

“我们是否可以依托数字法院建设，以应用场景为载体，搭建数据协同共享平台，从而突破区域‘点对点’协作的限制，借助市妇联等相关部门力量，在全市范围建立起统一的合作联动机制？”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未成年人与家事案件综合审判庭庭长方方提出了这一设想。

为此，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与嘉定区人民法院申报建立“涉家暴信息沟通共享机制”应用场景，推动建立覆盖范围更广的家暴防范联动机制。

这一想法得到了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的肯定与支持。该场景研发完成后，通过第一轮大数据筛查，在全市法院案件数据库中排查出 100 余件涉家暴案件信息。

2 月 28 日，方方率队赴市妇联调研座谈。此行，她就带上了上述 100 余件涉家暴案件信息，其中包含了上海法院 2021 年至今制发的所有涉家暴的人身安全保护令。

市妇联权益保障部负责人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涉家暴案件信息共享机制是一项社会治理创新之举，可以使法院与市妇联形成合力，依托市妇联基层‘妇女维权驿站’项目，邀请社会力量共同参与家庭暴力的预防和惩治，提高反家暴的专业性。”

“有几位当事人名字很熟悉。像这一位，这一位，还有这一位……”市妇联权益保障部相关负责人也指着 100 余件涉家暴案件信息名单说道。

据她介绍，市妇联一直致力于反家暴相关工作，与部分法院也存在着沟通协作。但这种沟通协作没有体系化、制度化，导致市妇联无法及时帮助到更多处在家庭暴力困境中的妇女儿童。“从法院获得涉家暴案件信息的举措，对于加强妇女儿童保护具有重大意义。”

“信息化、及时性、高层级、补短板是‘涉家暴信息沟通共享机制’应用场景建设的四大目标。”方方介绍，该场景计划以上海法院审判办案系统、上海法院裁判文书

库为依托，筛选出上海法院所制发的“人身安全保护令”裁判信息，并推送至市妇联等相关部门。

“涉家暴案件情况复杂多变，且部分案件具有紧迫性，受家暴者亟需帮助。”方方表示，该场景有利于形成常态化、制度化涉家暴信息沟通共享机制，促进涉家暴信息的及时跟进，确保市妇联等部门及时介入到妇女儿童权益保护中。

场景的“高层级”特点，则来自于上海法院和市妇联的“强强联手”“全面合作”。实践中，保护令申请对象情况各异，有的申请人存在人户分离、居住地迁移等情况，在以往基层法院与区级层面“一对一”“点对点”的对接模式中，容易出现超出区法院和属地单位保护范围的情况。

而“涉家暴信息沟通共享机制”应用场景从设立之初就“剑指”全市法院所有涉家暴案件信息。后续，该场景还将在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的指导下，探索实现相关案件信息的实时化、自动化推送，最大限度减少保护不力的情况发生。

“一方面，法院对人身安全保护令等执行力量不足，而市妇联具有较强的基层组织力量。另一方面，市妇联缺乏家暴信息来源，而法院数据库保存了较多涉家暴案件信息。”方方总结道，“我们两方联合，恰恰实现了‘1+1>2’，通过汇集法院、市妇联及更多其他社会力量，合力铸就‘司法+’多重反家暴‘保护墙’，真正把妇女儿童权益保护落到实处。”

四十不惑，少年审判再启新程

人民法院报 2024 年 3 月 14 日 记者：孙航

3 月 1 日，阳光照进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

静静的走廊一头，未成年人与家事案件综合审判庭庭长顾薛磊逆着光走过来。刚写完一个案件判决，他揉了揉有些充血的眼睛。

走进顾薛磊的办公室，这里没什么特别之处。层层叠叠的卷宗，摆放整齐的书籍，唯有一张照片被摆放在显眼的位置。

“去年 2 月，我们一起看望少年法庭亲历者，我们的研究室老主任张正富，这是当时的合影留念。”

照片里，年过八旬的张老先生目光炯炯，正值壮年的顾薛磊微笑着靠在他身边。

两代法院人的同框，把记忆拉回到那段“创业”初期的日子。

40 年前，少年审判从这里启航。

在波澜壮阔的中国司法实践中，总有一些记忆，历经风霜洗礼，更显弥足珍贵。少年法庭的存在，是记忆里最具温情和希望的一抹亮色。

这项工作事关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事关亿万家庭幸福安宁。四十年峥嵘岁月，一代代法院人着眼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薪火相传，以破旧立新、一往无前的勇气和魄力，探索出一条独具中国特色的少年审判道路。

法槌起落，见证着无数失足少年重拾希望，也记录下无数家庭破镜重圆。诲人不倦，一声声“法官妈妈”“法官爸爸”，道出无数少年审判法官最动人的名字。

四十年砥砺奋进，始终不变的是少年法庭的初心和使命，是以实际行动践行为人民司法、为未成年人成长护航的铮铮誓言。

改革从这里启航

改革开放初期，社会迎来翻天覆地的巨变。社会转型伴随着阵痛，青少年违法犯罪问题日益突出。

从审理的案件来看，案件大幅增长，呈现低龄化趋势，且重犯率高、累犯率高，这一点引起了长宁区法院的关注和思考。

探索刚刚萌芽

长宁区法院指定一位经验丰富的法官集中办理少年犯案件，进行初步探索和经验总结。一段时间后，一名法官与两位人民陪审员共同组成合议庭，集中审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尝试审判制度和方法改革。

这一年是 1984 年，中国少年审判史的开端之年。

这一年，张正富带领长宁区法院研究室，一直在从事少年犯合议庭的调研工作。

“未成年人是一个有着鲜明差异、特殊需求而需要区别对待的独立群体，通过司法审判中特殊的处理方式，能够使成长中出现问题的未成年人得到帮助与支持，避免他们失去健康发展的机会，最终帮助他们回归社会、融入社会。”

在调研报告里，张正富写下了这样的文字。

曾担任少年法庭第一任负责人的左燕记得，当时法院系统内部对少年犯合议庭的成立争议很大。

这样的做法有无依据？是否符合“严打”的形势？违法犯罪分子抓进来一个也不容易，如果按照合议庭感化、教育的裁判思路，社会上这种人增多了怎么办？

最高人民法院和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的支持和重视，令长宁区法院备受鼓舞。

时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郑天翔对少年犯合议庭的建立和发展批示：根据未成年犯的特点，把惩罚犯罪与矫治、预防犯罪相结合，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的经验值得各地法院借鉴。

一颗稚嫩的幼苗正在生根发芽，经受着风吹霜打，也沐浴着关爱的阳光雨露。

1988 年 5 月，最高人民法院在上海第一次专门召开人民法院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经验交流会，明确提出“成立少年法庭是刑事审判制度的一项改革，有条件的法院可以推广”。借着东风，当年 7 月，长宁区法院正式成立独立建制的少年刑事审判庭。

继上海首创之后，江苏、北京、福建等省市相继开启少年法庭改革探索，并随之在全国范围内拓展开来，少年法庭开始成为人民法院审判工作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1990 年，最高人民法院在江苏南京召开第二次全国法院少年刑事审判工作会议，对少年法庭工作经验进行系统归纳和总结。

转过年来，《关于办理少年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试行）》下发实施。这是第一个从全国层面规范少年审判工作的司法文件，确立了未成年人刑事审判工作的基本原则和办案程序。

1991 年，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成立我国第一个未成年人案件综合审判庭，开启统一受理审判未成年人刑事、民事和行政案件之先河。

1998 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四川成都召开全国法院第四次少年法庭工作会议，提出“各中级人民法院应当建立专门的合议庭，有条件的应当建立独立建制的未成年人刑事审判庭”。

以机构改革为牵引，一条独具中国特色的少年审判道路，初步显现。

从“一域”到“全局”

几十年前的一个案子，左燕一直记得很清楚。

一个家住上海中山西路棚户区的男孩，到处盗窃。案子起诉到长宁区法院，按照少年审判的工作要求，左燕来到男孩家中家访，了解他的成长经历。

这是一个生活较为艰难的船民家庭，男孩是家中最小的儿子，上面还有四个姐姐。母亲是工人，文化水平不高，对这个唯一的儿子视若珍宝。

家访的当天，左燕正巧碰到男孩母亲刚刚从外面拾荒回来，她的一段话戳中了左燕内心最柔软的地方。

“那位母亲对我说，儿子判刑了以后就再也找不到工作了。所以从儿子被抓进去那天起，她就一直在卖破烂，儿子关几年她就准备卖几年，这样等他出来，结婚的时候就有一笔积蓄了。”

左燕的眼睛湿润了。

办案的时候，左燕把男孩的五次陈述做了对比，发现每次交代的内容都一模一样，应该是提前背好的。左燕把家访的情况告诉了男孩，向他讲明刑法和刑诉法的有关规定，晓之以理、动之以情。

后来，男孩主动供述了之前没有交代的犯罪事实。在公安和检察机关的协同努力下，案子做了补充起诉，男孩被判了五年半。出狱后，男孩改过自新，没有再犯，回归了正常生活。

张正富介绍，长宁区法院少年犯合议庭成立后，逐步探索出注重调查导致少年犯罪的具体原因、注重启发式疏导式教育方法、注重寻找感化点、注重处罚实效、注重判后回访考察等工作机制。

实践中，这些经验被反复践行，不断完善。

1987 年，长宁区法院开始提出“政法办案一条龙”，从羁押、预审、起诉、审判、辩护到管教各环节，充分调动公、检、法、司力量，把对未成年人的特殊关注和处理由单独的审判扩展到整个少年司法过程，实现从“少年审判”到“少年司法”的延伸。

来之不易的实践成果，出现在一次次全国法院工作经验交流会上，长宁区法院少年审判工作经验引发热烈讨论，也逐步获得广泛认可。

1991 年，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司法部发布关于办理少年刑事案件建立互相配套工作体系的通知，最高法、国家教委、团中央、全国总工会、全国妇联发布关于审理少年刑事案件聘请特邀陪审员的联合通知，在顶层设计层面正式确立“政法一条龙”和“社会一条龙”工作制度。

社会一条龙工作制度要求，社区工会、妇联、团委、教育等部门与法院相互协调，共同落实少年犯的帮教和解决就业、就读等问题。

1995 年，第三次全国法院少年法庭工作会议在福建福州召开，明确了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教育、感化、挽救”方针。在此后的 30 年里，这项方针贯穿于全国法院少年审判工作始终。

步入新世纪，少年审判驶入快车道。顶层设计部署，为进一步推动少年审判工作把脉定向。

2004 年，中共中央转发《中央司法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关于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的补充意见》，提出了“改革和完善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的要求。

这一时期，“完善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和涉及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的民事、行政案件的组织结构”“推动建立和完善中国特色少年司法制度”被写入《人民法院第二个五年改革纲要（2004-2008）》。

2006 年，全国法院第五次少年法庭工作会议在广东广州召开，最高人民法院启动了在 17 个中级人民法院设立未成年人案件综合审判庭的试点工作。

全国范围内的少年审判改革，大幕拉开。

一项特殊的希望工程自 1987 年 9 月，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成立少年审判庭，尚秀云便开始投身少年审判事业，一干就是几十年。

作为我国第一代少年审判法官，如今年过八旬的她，见证了少年审判 40 年的改革与探索。

“未成年人犯罪不同于成年人，他们心智发育还不成熟，人格还不稳定，可塑性强，对待他们不能像犯罪的成年人一样。”尚秀云在工作中探索出更加适合未成年人的审理方式。

走进海淀法院少年法庭，全国首创的“U”型法台沿用至今。

“U”型设计像一个张开的怀抱，保护着每一个走进法庭的“失足少年”。法台是暖色调，被告人席与课桌同高，每一处细节都体现对未成年人的特别关心和特殊保护。

这里不仅是查明事实、依法办案的场所，对于未成年人来说，这里更是他们改过自新的课堂。

少年审判，一项特殊的希望工程。

40 年来，少审法官们着眼对未成年人特殊保护、优先保护，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寓教于审”，积极开展庭前、庭中和判后教育感化工作，创造出一系列适合未成年人身心特点的审理、执行方式。

圆桌审判、社会调查报告、轻罪记录封存、心理评估干预、延伸帮教……一项项探索，一项项机制，根植司法改革的沃土，在广袤大地上开花结果、枝繁叶茂。

少年审判的 40 年，也是全国法院勇于探索、改革创新 40 年。

“完善未成年人案件审判制度和机构设置，推行适合未成年人生理特点和心理特征的案件审理方式及刑罚执行方式的改革。”

新的要求被写入《人民法院第三个五年改革纲要（2009-2013）》，在机构设置之外，更多关注案件审理的方式方法，成为下一个五年的工作发力点。

7 岁的小邓不慎摔倒在学校走廊的斜坡上，左上门牙牙冠折断，需等小邓成年后进行牙齿种植。18 岁之前，小邓每年都要到医院复查，费用如何承担？

许多类似案件，因治疗持续时间较长，医疗机构和司法鉴定机关很难预估后续治疗费用，原告也很难在一次诉讼中解决所有治疗费用。为延续诉讼时效、搜集证明后续治疗与侵权事故有关的证据，小邓和父母只得每年起诉，被告校方也要年年应诉。

11 年，小邓一家提起了 9 次诉讼。特别的是，从 2013 年起，每年接待他们的都是同一位法官。时间长了，法官处理每一年的诉讼更加“轻车熟路”，小邓一家每年在法院的时间也少了。

2014 年，海淀法院未成年人案件审判庭开始探索首审责任制，涉及同一未成年人权益的案件，无论是刑事还是民事，均由同一位“首审法官”负责审理。

“该制度不仅很好体现了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也有效提高了案件的审判质效。”未成年人案件审判庭庭长秦硕介绍，探索首审责任制的初衷是让涉诉的孩子和家庭在陌生又严肃的诉讼环境中，找到一份安心。

“现在首审责任制已经成为我们的常态化工作机制。”秦硕表示，少年法庭更加关注未成年人成长，仅仅就案办案并不能解决“成长的烦恼”。首审责任制建立法官与未成年人的一对一联系，法官长期陪伴孩子成长，更加了解孩子们的生活经

历和家庭情况，并在交流沟通中主动发现问题，通过家庭教育指导开展预防性工作，避免孩子出现违法犯罪行为。

合适成年人到场制度，给予失去家庭亲情的被告人以温暖，鼓励他们积极悔过自新，这是山东临沂两级法院的新尝试。

构建心理辅导机制，引领失足少年走出泥潭、重获新生，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更加注重未成年人的心理健康。

打造法治宣传教育品牌“豌豆荚”，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为孩子们成长构建全链条保护体系。

探索罪错未成年人分级干预机制，山东省临沂市兰山区人民法院耐心细致地对待错误不一的问题少年们。

实践的探索，构成了解决问题的良方。

40 年历程，一批批特色制度和工作机制在少年法庭这片试验田里茁壮成长，一大批成功经验被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刑事诉讼法以及相关司法解释所采纳和推广。

2012 年，刑事诉讼法修订，增设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专章，在刑事诉讼中对少年审判“教育、感化、挽救”方针和“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予以确立。

与此同时，少年审判也带动了刑事诉讼领域侦查、检察、羁押、管教等制度的变革，推动形成了一支包括公、检、法、司等多部门力量，且相对稳定的少年司法工作队伍。

勇立潮头的破局者

2012 年，最高人民法院在河南郑州召开全国法院第六次全国少年法庭工作会议。经中央政法委同意，未成年人综合审判庭试点中级法院范围从 2006 年的 17 家扩展至 49 家，基本涵盖了除西藏拉萨以外的各省会（首府）城市的中级人民法院。

在更大范围内推进少年审判改革，正当其时。

时光迈过崭新的节点。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将少年儿童工作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全社会关心少年儿童成长的氛围愈发浓厚，依法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迈出坚实步伐。

“少年法庭工作卓有成效，这是中国司法领域一张光彩夺目的名片，要保护、发展好，创造少年司法的中国经验和中国方案。”

肯定之余，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陈光中对少年审判寄予厚望。“我国进入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新时期，少年法庭的发展在司法改革大背景下遇到了一些新情况，正处于一个关键的历史时期，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时代是出卷人，等待着勇立潮头的破局者。

一组数据在最高人民法院少年法庭 30 周年座谈会上公布——

截至 2014 年，全国四级法院均已建立少年审判专门机构或者指定专人审理，共设立少年法庭 2253 个，合议庭 1246 个，少年刑事审判庭 405 个，综合审判庭 598 个。30 年来，全国法院少年法庭共判处未成年犯 150 余万人。2002 年以来，未成年人重新犯罪率长期保持在 2% 左右，远低于全部罪犯的重新犯罪率。

多元化少年法庭审判组织格局逐步建立，一支高素质的少年法庭审判队伍日渐壮大，中国特色未成年人审判制度和工作机制日臻成熟。

接下来，少年审判将何去何从？

“少年审判和家事审判两者程序相近、理念相似、资源共享，涉少家事案件应当进入少年审判的视野，保障涉少案件审理的稳定性、专业化。”上海社会科学院党委副书记、法学研究所所长姚建龙曾给出这样的论断。

2016 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全国范围内选择 118 家中基层法院开展为期两年的少年家事审判改革试点，以江苏为代表的多个省份建立起少年家事审判庭，少年审判开启新的改革历程。

校园欺凌、性侵等侵犯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涉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不时发生，利用网络空间侵犯未成年人犯罪更加多元且隐蔽……

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未成年人保护遇到不少问题和挑战。

2020 年，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两法”修订，首次明确了“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从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司法六个方面完善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构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未成年人保护制度体系。

在新的时代和法律背景下，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加强新时代未成年人审判工作的意见》，重新界定少年法庭的受案范围，深化未成年人案件综合审判改革，谋划少年法庭工作改革发展。

2022 年，全国法院第七次少年法庭工作会议召开，全面准确实施未成年人保护法律法规，更加有效融入“六大保护”，新时代少年法庭工作发展迎来新的机遇。

“未成年人保护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综合治理。”姚建龙表示，未成年人问题产生是多种因素交织的结果，加强未成年人保护一定要形成合力。司法在其中是底线，需要法院发挥自身专业性，立足审判职能，为未成年人保护托底。同时，少年司法具有特殊性，法院也是推动保护的动力源，要积极主动融入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保护，促进“六大保护”体系发挥出应有的作用。

家庭是孩子的第一个课堂。

早在 2014 年，最高人民法院与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民政部共同发布《关于依法处理监护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行为若干问题的意见》，对失职监护人“亮剑”，明确侵害未成年人权益可依法撤销其监护人资格。

2022 年，家庭教育促进法正式实施。

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发出全国第一份家庭教育令，从法治角度督促父母当好合格家长。

2023 年以来，全国法院以更加有力的司法保护促推家庭保护、学校保护、社会保护、网络保护、政府保护协同发力——

3.7 万名法官担任法治副校长，走进课堂播下法治的种子，面向未成年人加大法治宣传，创新动漫、案例等普法方式。

会同有关部门发布办理强奸、猥亵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司法解释、办理性侵害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意见，织密司法保护网络。

会同全国妇联发布开展家庭教育指导工作的意见，发布保护未成年人权益典型案例，发挥案例引领示范作用。

“少年审判是一个和社会治理紧密相连的工作，是人民法院展现司法温情的重要途径。”从事少年审判 20 余年，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陈海仪认为，少年审判工作一定要和社会治理紧密结合，与相关部门形成合力，避免成为“孤岛”。

“六大保护”融合发力，少年审判迈向更广阔的空间。

向着新目标攀登

“在孩子们的节日，‘大朋友们’为守护小朋友健康成长提出了 33 条真知灼见。”

2023 年 6 月 1 日，最高人民法院“法治护航 伴你成长”六一公众开放日活动现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张军与代表委员、专家学者、师生代表共商未成年人司法保护。

新时代开启新征程。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加强烈，对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更为关注，对全面加强未成年人权益保护提出了更高要求。

如何做深做实对未成年人的全面保护，有的放矢解决当前少年审判存在的问题，进一步提高少年法庭工作水平？

找准问题，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最高人民法院调研显示，所有涉少刑事案件中的未成年人，有一半以上来自残缺家庭、问题家庭，未成年人犯罪与婚姻家庭问题密切相关。

“我国少年法庭最早关注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随后将未成年人被伤害的案件也纳入视野。但是未成年人在民事案件尤其是婚姻家庭案件中的权利，没有受到足够的关注。”

北京市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主任佟丽华表示，少年审判工作自起步之时便多以刑事审判为重心，一定程度忽视了未成年人司法的综合保护、未成年人犯罪的前端预防。

全面加强未成年人司法保护，亟须贯通涉未成年人民事、行政和公益诉讼，并随之将工作重心转移到涉未成年人民事、行政和公益诉讼案件。

座谈会上，最高人民法院释放建立未成年人审判“三合一”工作机制的重要信号。

“以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少年审判改革，大多是自下而上的。此次最高人民法院自上而下明确改革方向，起着重要示范作用，在少年法庭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研究未成年人保护工作 20 余年，佟丽华注意到，少年审判专门机构的早期探索，大多集中在中级和基层法院。“在最高人民法院和省级法院，专门机构的建设一直没有大的突破。没有专门的机构和编制，很难培养出专业的少审法官。”

放眼全国，河北率先破局。2023 年 11 月，随着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和石家庄等 9 家中级法院成立少年审判庭，河北全省三级法院专门少年审判机构实现了全覆盖。

2023 年，最高人民法院成立少年审判工作办公室，依托民事审判第一庭运行，深入研究分析案件反映出来的家庭保护、学校保护、社会保护、网络保护、政府保护等方面存在的深层次问题，促进少年审判在“抓前端、治未病”上下更大功夫。同时，促进少年审判刑事、民事、行政三合一司法保护机制落实，强化家事审判对未成年人的保护。

“‘三审合一’不仅是办理未成年人案件的部门整合，更是司法理念的更新，体现着以未成年人为中心的一种新的内在的法律逻辑。”

佟丽华进一步解释，办理民事案件的时候，要考虑到未来可能出现的行政和刑事的问题，办理刑事案件的时候，需要回溯孩子的家庭和学校教育都出了哪些问题。

“这样办一个案子，不仅保护了一个孩子，而且能够从源头发现更多问题，优化整个未成年人成长环境，让更多孩子受益。”

“少年审判工作实现更高水平发展，离不开机构的专业化。”全国人大代表、中国航发湖南动力机械研究所专职总师单晓明建议，最高人民法院成立独立的少年审判机构，专门负责涉未成年人案件的审判，最大程度提升少年审判专业化水平，为彻底、全面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提供组织保障。

2023 年以来，人民法院坚持“公正与效率”工作主题，积极回应当前工作面临的问题和挑战，开启了一项项直切要害的务实改革。

进一步推进少年审判理念现代化，深化改革创新，会同有关方面共同做好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共同筑牢未成年人保护的堤坝，最高人民法院目标清晰明确。

四十不惑，少年审判再启新程。

向着新目标攀登，把全方位保护未成年人的各项举措落实落地，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筑起坚不可摧的法治屏障——

少年审判大有可为、未来可期。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少年审判工作办公室岳琳对本文亦有贡献）

全国人大代表杨宝玲、冉慧、唐利军谈离婚后抚养权、探望权的执行——依法督促父母履行责任 多效并举撑起“法治蓝天”

人民法院报 2024 年 3 月 15 日 记者：何雨潇

“为人父母，是否需要经过考试？”这是近年来网络上频频出现的一个颇具争议的话题，道出了许多人对于未成年人家庭教育现状的担忧。在家事纠纷的司法实践中，时常能看到失职失责的父母的身影。

父母双方离婚后，无论是否直接拥有孩子的抚养权，都拥有抚养和探视子女的权利和义务。但是实际上，有的父母会把孩子当作“皮球”一样踢来踢去，都不愿抚养或探望；有的父母则会采用激烈的、不合理的手段去阻止另一方抚养或探望孩子，甚至是抢夺、藏匿孩子，对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造成严重损害。

2022 年 1 月 1 日，家庭教育促进法正式施行，由此开启了父母们“依法带娃”的时代。为准确适用法律、规范全国法院开展家庭教育指导工作，2023 年 5 月 30 日，最高人民法院会同全国妇联制定了《关于开展家庭教育指导工作的意见》，其中规定，法院在对离异家庭进行家庭教育指导时，如有发现父母、监护人任意一方以抢夺、藏匿未成年人等方式干扰对方行使探望权、监护权的情况，应当对其进行监护职责教育，敦促其改正错误行为。

“离婚后抚养权、探望权的执行，不仅关系着法院的判决能不能落到实处，还紧密关系着未成年人权益的保护。”这一现状引起了全国人大代表，天津市东丽区华明街道胡张庄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党支部书记、理事长杨宝玲的关注。在 2023 年全国两会上，杨宝玲提交了一份关于保护未成年人监护人依法取得抚养权行使探视权的建议。

“法院办理建议有速度、有温度、有力度！2023 年，人民法院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实实在在的事。比如借助 APP 或小程序等辅助抚养探视，打造亲情探望室，结合民事调解、说服教育、强制执行等多种方式化解矛盾纠纷等多项工作，效果都很好。”杨宝玲欣慰地说道。

“这是科技为家事审判工作赋能的生动实践，值得点赞！”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市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桃花源街道天山堡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冉慧对人民法院利用信息化手段辅助离婚双方顺利探望、抚养孩子所推出的各项举措称赞连连。

冉慧建议，人民法院要深入研判分析家事案件中反映出来的家庭保护、学校保护、社会保护等多方面的深层次问题，通过司法建议、法治宣传等多种形式，进一步做深做实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工作。要加强科技赋能，以科技助力家事审判更有温度、让未成年人司法保护更有力度。此外，还要吸收更多热爱未成年人保护事业和善于做调解工作的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到家庭教育指导工作中，提升家庭教育工作实效。

“法院通过发出家庭教育指导令等方式开展家庭教育指导工作，有效促进未成年人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依法履行家庭教育职能，切实维护了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对预防未成年人犯罪、保障未成年人健康成长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全国人大代表、四川职业技术学院食品与生物技术学院教授唐利军肯定地说道。

杨宝玲代表建议，人民法院在抚养权、探视权案件审判中要充分尊重孩子的意愿，推动建立由妇联、未成年人保护组织、街道居委会等多方参与的执行机制，共同关注呵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守护好每一份童真。

为进一步促进抚养权、探望权的有序行使，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设立了涉未成年人纠纷专项执行团队，加强执行中的调解、和解工作，同时合理适用强制措施，多方联动形成合力，力促纠纷实质性化解。

对此，唐利军建议，人民法院在审判、执行、调解这类案件时，要始终坚持未成年子女利益最大化的理念，特别注重对未成年子女意愿的尊重，用善意文明的执行方式，为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登门入户调解遗产纠纷，《法院里的“枫桥”》让兄弟和好如初

最高人民法院微信公众号 2024 年 3 月 17 日 编辑：邢天然

河北省阳原县人民法院法官张春瑞：你坐着，你别管了，你坐着。

王老太太是河北省张家口市阳原县化稍营镇村民，前来探望她的人是阳原县人民法院的张春瑞法官，这已经不是张春瑞法官第一次来家里了，王老太太儿子们之间的遗产之争，就是由张春瑞法官帮忙调解的。王老太太的老伴已经去世了，她有五个儿子。2020 年大儿子也因病去世，老大生前没有结过婚，而是抱养了个女儿小芳（化名），老大去世时小芳只有 13 岁，由老四继续抚养。

老四：那孩子当然她愿意跟我，当时就说，后来我就领着抚养她了，抚养时还得转学，学校的学籍给她转上了，跑了好几趟。

老大去世后留下了包含保险赔偿金在内的 13 万元左右的遗产，这笔钱成为了其余几个兄弟之间的矛盾导火索。

河北省阳原县人民法院法官张春瑞：老四认为这个钱应该是由王老太太跟老大的女儿继承，老三认为应该哥弟兄都有继承权。

老四：我三哥就把这十二万几，也不知道是多少，就一遍提成现金了，完全是也没和我商量，啥也没作声，后来我才知道这事儿。

根据老四回忆，老三和老二商量把这十几万元钱给四个兄弟和老大的养女小芳每个人分别分一万元左右，剩下的几万元钱由老三代为保管处置。

老四：我说不能分这钱，咱意思说给人家这孩子留着，迟早这孩子会长大，小时候用钱就用，不用长大了用，他们俩都不同意，说你老四也没有说话的权利，这钱（老三和老二）就这么决定了，就是这么个意思。

老五：我四哥跟我二哥跟我三哥他们起的冲突。

记者：你是什么时候知道还有这么一笔钱。

老五：我啥也不知道，就是他们，我啥也不管，意思就咱就伺候我那老娘就完了，别的事儿我不管你这个问题。

河北省阳原县人民法院法官张春瑞：老五最朴素的想法就是咋样都行，和为贵。

王老太太已经八十多岁高龄，常年瘫痪在床，脑子有时也不太清楚。所以她对于老大的遗产分配没有发表更多意见。照顾王老太太生活的老五也不愿意掺和进这个纠纷，老二听老三的，就这样兄弟间的矛盾主要集中在了老三和老四之间。为了平息这场纠纷，当地的村委会也没少操心。

河北省阳原县高墙乡台庄村妇联负责人张春丽：村委会就是老四老三都来过，哥儿两个，下午两点就来了，都得四五点、五六点才走，调解三四次了，调解不成功，真难调解。

老四：三哥就说“那个钱我不给他，老四想告就告”。私下沟通是肯定解决不了，咱通过大队乡里是解决不了，只能寻求法律部门了，法律面前是人人平等的我想着，咱就找人家法院，叫人家给处理吧。

就这样老四来到了河北省阳原县人民法院化稍营人民法庭，见到了当时的庭长张春瑞法官，张春瑞法官从专业的角度帮老四梳理了事情的脉络，发现很多手续都是缺失的，需要立即补办。

河北省阳原县人民法院法官张春瑞：第一个关系就是证明这个老大的女儿跟老大是收养关系，第一步证明这个。第二步证明老大死亡以后，这个女儿应该由谁作为监护人进行抚养，确定以后老四才有以监护人的身份才能提起诉讼。

老四：抚养手续，还有我哥的死亡证明，还有其他好多的手续，一点手续不健全，法官没法给你下结论。后来乡里、大队、县里都给出了证明。

老四将所需手续补办齐备后，张春瑞法官考虑到王老太太年事已高，坚决实行“三不到庭全到家”便民措施，带领书记员主动来到村里，与村干部共同多次登门入户，展开了深入细致的调解工作，并予以亲情疏导，详细解释了有关遗产继承的法律规定。

河北省阳原县人民法院法官张春瑞：七十岁以上的老人因为来法庭不方便，我们就可以上门服务。还有就是三十里以外的偏远山区没有交通工具的，还有残疾人行行动不便的可以不到庭，我们一律到家上门服务，所以说“三不到庭全（部）到家”。我们跟老太太见面以后做了王老太太的工作，讲了一些法律，让她知道她就是第一顺序继承人，然后老大的女儿是第一顺序继承人，她们都有继承权，兄弟之间没有继承权。如果第一顺序继承人没有的话，才第二顺序继承人继承，兄弟姐妹才可以继承。老三开始不知道法律是这么规定的，他也想要要求抚养这个老大的女儿，但是老大女儿愿意跟老四一起生活，完了以后又跟老二，老二在外地，电话沟通，他也同意咱们的调解意见。

通过多次耐心细致的调解和说法论理，王老太太的四个儿子表示同意按照法律规定办事，认同去世兄长的 13 万元遗产由母亲王老太太和侄女小芳两人平分，每人继承 65000 元钱，对于属于未成年养女小芳应继承的遗产，由老四作为法定监护人代为保管，而王老太太应继承的遗产由照顾她的老五代为保管。在张春瑞法官和村干部的召集下，一家人签订了遗产继承纠纷处理协议，并履行完毕，该纠纷在诉前得以圆满化解。

老四：把钱给了我，我就回来了，就这么就算圆满地了结了。

老五：原先纠纷挺大，最后人家给处理了，挺满意。

河北省阳原县人民法院法官张春瑞：把每一件民事案件都办好，确实也不是简单的活儿，每一个简单的案件都要付出好多的心血，但是调解完以后双方当事人都满意，调解结案了，我们心里面也相当痛快。

近年来，河北省张家口市阳原县人民法院为了有效助力基层社会治理，践行“枫桥经验”，坚持能动履职，推行“三端共治”解纷工作法，抓前端，牵头组建“纠纷隐患排查群”，源头预防矛盾纠纷，疏中端，构筑多层次非诉解纷模式，为群众提供家门口司法服务。治末端，强化诉与非诉的无缝衔接，取得良好效果。

河北省阳原县人民调解员（退休法官）张树：咱们先调解，如果这样调解不了了，然后再按照法院的程序正式立案。

在这一起交通事故纠纷的调解过程中，负责调解工作的两位调解员，都是河北省阳原县人民法院退休的法官，多年的审判经验使得他们对矛盾事件的焦点分析更具专业性和预判性，这使得他们在退休后做起调解工作也有很大的优势。

河北省阳原县人民调解员（退休法官）张树：原告开始主张四万块钱，被告认为她没碰到原告，不应该赔偿，咱们通过讲解法律，因为交警队已经作出事故责任认定了，认定被告骑这个电动自行车将原告撞伤的，况且被告是逆行的，被告应该承担全部责任。关于这个责任划分问题，这是以交警队的为准，你口说没碰着这不行，有交警队这个事故认定书。最后被告认识到这个事故责任全是她的责任。

调解员：给原告两万块钱行。

被告：行。

河北省阳原县人民调解员（退休法官）张志：以前在法院也做过调解，诉前、诉中、诉后都有调解，对这个调解的程序、调解的方法还比较熟悉。

河北省阳原县人民调解员（退休法官）张志：两万块钱调解成就出个调解协议，这个事就算一次性了结，以后双方再无其他纠纷，这个事都是过失，不是故意。

原告：虽然不是故意，但是我感觉这就有个态度。我不稀罕这个钱，但是这可不是钱的事，大姐。

河北省阳原县人民调解员（退休法官）张志：道个歉，行。

河北省阳原县人民法院院长王秀文：不仅案子咱们把它结了，双方当事人从心里这种抱怨或者心结，咱们力争都要给它解开。

交通事故纠纷的事情刚刚处理完，几位调解员又和阳原县人民法院立案庭的庭长张少卿法官开启了调解业务交流会。

阳原县人民法院立案庭庭长张少卿：这种无效的情况下，其实这个赔偿就好说了。

阳原县人民法院立案庭庭长张少卿：“枫桥经验”我理解的就是依靠人民群众，更多地广泛地发动更多的这种社会力量，共同参与这种社会矛盾的解决和化解当中。

阳原县人民法院立案庭庭长张少卿：这点事的解决肯定不是一个部门能解决掉的。

河北省阳原县揣骨疃镇司法所所长郭建东：我做调解工作有八年了，我原来是村里边的村书记，所以对农村这一块是比较了解的。

阳原县人民法院立案庭庭长张少卿：我们分别和妇联、工会、人民银行还有工商联等六个部门都建立了诉调对接机制，然后让他们的精英骨干和我们司法局的人民调解员，还有我们法院组建了一批特邀调解员的队伍，以及我们速裁法官共同开

展这个诉前化解工作，将这些群众的纠纷力争是化解在诉前的阶段，不让矛盾纠纷进一步扩大。

河北省阳原县揣骨疃镇司法所所长郭建东：法官都是包的各个乡镇，你像我们这块儿法官，经常我们跟法院联系的时候，给他们打电话就可以了，或者有的时候他们直接就参与在咱们的调解之中了。

河北省阳原县人民法院院长王秀文：我们的速裁团队在短时间内审理案件的基础上，也把执行工作也一并就给它处理掉了，就是说让老百姓直接在这一个案子，进这一个门就实质性地化解这个纠纷，是这么一个理念。

阳原县人民法院立案庭庭长张少卿：我们整体速裁团队去年平均结案用时大概在 20 天左右，今年已经降到了 11 天半，它是和诉前化解挂钩的，也就是说这类案件我们小额诉讼去适用，包括速裁团队去办理它的前提是我们在诉前阶段已经去做了大量的这个工作了。

阳原县人民法院立案庭庭长张少卿：打印一下笔录，咱们这个案子就结束了。

把工作做在前面，多想办法，让矛盾化解在萌芽之时，这正是“枫桥经验”的宗旨。当然要实现社会和谐发展，还需要我们每一个人的共同参与，多一些体谅、多一些智慧、多一些真诚以待。

媒体聚焦

【新华社】高法报告提出遏制高额彩礼引发共鸣

最高人民法院微信公众号 2024 年 3 月 10 日 记者：鲁畅 潘德鑫 陈诺

全国两会上，高额彩礼现象再次成为热点话题。

3 月 8 日提请审议的最高法工作报告提出，依法遏制高额彩礼，让婚姻始于爱，让彩礼归于“礼”。

彩礼多寡，看似小事家事，却是影响社会风气的大事。

2019 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提治理“天价彩礼”；今年初，最高法施行“彩礼新规”。国家下力气整治这一现象，彰显对高额彩礼等移风易俗重点领域问题说“不”的鲜明态度。

作之于细，累之成风。代表委员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从整治“舌尖上的浪费”到管住“车轮上的铺张”，以微小之变，赢得党风、政风为之一新。整治高额彩礼问题，也是把小事家事当成建设文明乡风的大事。

在一些地区，高额彩礼流行，名目不断翻新。有的已演变成“甜蜜的负担”，有的家庭陷入“因礼返贫”的窘境，有的以婚恋之名行诈骗之实。

代表委员说，在旧风俗影响下，高额彩礼之风不断蔓延，扭曲的“婚恋价值观”加剧婚姻焦虑，极易成为制约乡村精神文明建设的大问题。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全国人大代表、宁夏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法学研究所所长李保平说，从治理高额彩礼等问题破题，促进乡村移风易俗，将有力推动和美乡村建设。

治理高额彩礼，不可能一蹴而就。要关注基层新变化，找寻新办法。全国两会上，一些代表委员提到，不少地区已经展开婚俗改革，逐步使彩礼回归于“礼”。

安徽省阜阳市兴起 10001 元彩礼（寓意万里挑一）、互相赠礼等新风俗；河北省河间市提倡“不比彩礼比幸福”，去年 1000 对登记新人“零彩礼”“低彩礼”占比达到 88%；贵州省岑巩县把高额彩礼降下来，女方又多以“压箱钱”返还。

2023 年 11 月 3 日，浙江省杭州市临平区塘栖镇丁河村举办集体婚礼。八对新人在村民和游客的见证下喜结良缘，并发出《婚俗改革倡议书》。

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焕发乡村文明新气象。

一些代表委员认为，高额彩礼之风不能简单归结于落后的传统。男女比例失调、农村养老焦虑、教育程度不足等问题的存在，一定程度影响着治理难度。

发挥“自治”作用。

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乡村熟人社会习惯于“讲人情、讲关系”，但用好这层关系也可以实现引导效果。

“推进移风易俗，红白理事会是个好抓手。”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九龙镇五坑村党总支书记闫永志代表说，听说哪家要摆席了，发动村里“五老”“乡贤”送“理”上门，能解开很多家庭心里的疙瘩。

2024 年 1 月 5 日，在广西柳州市融安县浮石镇六寮村议事协商主题广场，镇、村干部和村民在议事。

善用“法治”方法。

针对彩礼纠纷，多地法院已适用“彩礼新规”定分止争。

“司法审判提供有益经验。”河北省河间市兴村镇大庄村党支部书记石炳启代表建议，进一步发挥典型案例作用，采取进村普法、巡回法庭进乡村等措施，实现“办理一案、治理一片”的良好社会效果。

做好“德治”文章。

让礼回归本质，以德化解不良风气，乡风文明之花将盛开在广袤的农村大地上。

“治理高额彩礼歪风陋习，要拿出遏制‘舌尖上的浪费’的决心和态度。”贵州省岑巩县塔山村党支部书记郑培坤代表建议，厉行节俭之风，干部带头引导群众转观念、破陋习，发挥村规民约激励作用，助力移风易俗。

李保平代表说，遏制高额彩礼歪风，要大力推进移风易俗工作。实施乡村振兴，不仅看农民口袋里的票子有多少，也要看农民的精神风貌。

法答网精选问答（第三批）节选

人民法院报 2024 年 3 月 21 日 责任编辑：刘强

问题 3：遗产管理人是否有独立的诉权？

答疑意见：民法典规定了遗产管理人制度，但未对遗产管理人是否具有独立诉权进行明确，因此对于遗产诉讼中遗产管理人能否以自己的名义起诉或应诉问题，目前尚存争议。从立法目的来看，遗产管理人制度是为了保障遗产的完整性和安全性，公平、有序地分配遗产，使遗产上各项权利得以实现的一项综合性制度。为保障遗产管理人基于遗产管理目的而实施相应民事行为的实体权利，包括对债权债务的处分权等，应当认可遗产管理人在遗产管理期间享有相应的诉权。从起诉条件来看，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二）有明确的被告；（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四）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遗产管理人在履行遗产管理职责时提起民事诉讼的，可视为满足“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条件。

司法实践在一定程度上也肯定了遗产管理人的独立诉讼地位。如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一款、第十条第一款规定，遗产管理人在执行程序中可以作为执行人、被执行人。最高人民法院在（2020）最高法民再 111 号翁某、吕某第三人撤销之诉再审案中认为，一般情况下，遗产管理人及受托人进行遗产收集，为遗产管理、分配创造条件，有利于遗嘱受益人权利的实现，也有利于及时按照遗嘱分配遗产。因此，遗产管理人及受托人在收集遗产过程中遇到障碍，无法及时收集并有效管理遗产时，有权以自己名义对相关民事主体提起民事诉讼以保证遗产安全。

需要明确的是，即使承认遗产管理人享有相对独立的诉权，这种诉权的行使也应当被限定于遗产管理人的职责履行范围之内；与履行遗产管理职责无关的诉讼主张，不应得到支持。在法律、司法解释未明确遗产管理人的独立诉权之前，有必要对“遗产管理人在民事诉讼中的独立主体地位”持审慎态度，避免给大量的继承诉讼带来实操层面的困难。司法实践中，不同的案件还需结合案件事实情况后再分析适用。

点评专家：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石佳友

点评意见：遗产管理人是民法典继承编的一项重要制度创新，其目的在于保障遗产的有效管理与分配；遗产管理人包括遗嘱执行人、继承人、被继承人生前住所地的民政部门或者村民委员会。但民法典等现有法律并未直接规定遗产管理人的诉讼主体资格等问题，因此，如发生争议，遗产管理人能否以自己的名义进行起诉或应诉是亟待明晰的重要问题。本答疑意见对这一问题作出了回应，既结合了民事诉讼法关于起诉资格的相关规定，也总结了此前司法实践的相关经验，具有明确的指引作用。根据答疑意见，遗产管理人与争议诉讼具有直接利害关系，因此应具有独立的诉讼地位，可以其自身的名义进行起诉和应诉。但是，遗产管理人的诉讼地位是基于其与遗产管理这一法定职责的关联，因此其在诉讼中的相关权限应被限定于遗产管理人的职责履行范围之内，而不能随意突破这一范围，以避免对相关继承诉讼实践造成不必要的困难。应当承认，在现有的法律框架下，采取这样的审慎态度是必要的。

全国首例！家暴男无视人身安全保护令被追究刑责！

香洲法院微信公众号 2024 年 3 月 20 日 撰稿：香法宣

当离婚没离掉暴力，
当不顾禁令屡屡纠缠，
香洲法院果断“出手”！
这次，不只是拘留！

2024 年 3 月 19 日，因屡次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对前妻大打出手并恐吓威胁，香洲法院以拒不执行裁定罪对被告人张某作出一审判决，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这是全国首例因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被法院以拒执罪判处刑罚的案件。

离婚也离不掉的暴力

2015 年 1 月，小丽和张某结婚，两人共同养育了一个可爱的女儿，小丽更是辞职在家，专心照顾家庭。婚姻期间双方时有争吵，张某偶有打骂。

2019 年 4 月，两人离婚，但没离家，一家三口仍住在一个屋檐下。小丽重新找了份工作，张某心里有些不是滋味，时常翻看小丽的手机，甚至限制小丽外出工作，拳脚相加也变得频繁。小丽不堪忍受，带着孩子搬走，张某就追到单位，打骂、威胁。几番往复，小丽下定决心，向香洲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

2023 年 10 月 13 日，香洲法院作出人身安全保护令：禁止张某对小丽实施殴打、威胁等家庭暴力行为；禁止张某骚扰、跟踪、接触小丽及女儿。

无视禁令持续施暴

保护令发出后，张某并没有收敛。

2023 年 11 月某天，张某又到小丽单位吵闹，为避免冲突，小丽乘坐同事的车离开，张某便驾车追逐，逼停小丽后，从车上拿出一支棒球棍，拉开车门就朝小丽挥去，连打五、六下才停手，同事出声劝阻，也被打伤。

张某签收保护令不出一个月，就再次施暴，公安机关果断对张某处以行政拘留十日，并处罚款，在法院严厉训诫后，张某写下悔过书。可前脚刚获自由，张某后脚就又开始威胁、恐吓，持续向小丽发送刀具照片、农药物流信息截图等大量死亡威胁短信。

小丽深感恐惧，只得再次向法院求助。香洲法院随即对张某作出司法拘留十五日的处罚。考虑到张某漠视司法权威，屡次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拒不履行生效裁定确定的禁止事项，香洲法院以涉嫌犯罪将案件线索移送公安机关，张某于 2024 年 1 月被逮捕。

能做的不仅是径行裁判

张某的案子，再次回到香洲法院，这一次是刑事案件。

“我觉得是家庭琐事，夫妻争吵打闹是正常的，至于那些威胁，不过是希望她回来……” 张某抗拒、不解。

阅卷完毕，承办法官第一时间想到的，是“狠狠打击、严厉处罚”，然而，考虑到张某屡次无视法院禁令，数次拘留也没能摀住他的“拳脚”，相较于一判了之，更需要让张某从情感上认知并承认自己的错误、放下过往。

“对行为人是否再次犯罪的预测，不能脱离对其以往行为的考察。” 仔细梳理案情后，法官请来心理与家庭暴力问题专家，对小丽和孩子开展心理测评及辅导，据此了解和评估张某的成长环境、犯罪动因及人身危险性。

为实现罚得其所、罚当其责，法官两次前往看守所提审张某，张某终于流下悔恨的眼泪，并认识到“家暴不是家务事，打人是不对的……”

家门之内，不是法外之地

2024 年 3 月 19 日，香洲法院对张某当庭宣判，以拒不执行裁定罪，判处其有期徒刑八个月。

宣判后，法官当场对张某开展严肃的法庭教育，“每一个成年人，都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家门之内，不是法外之地，家庭暴力，即便披上‘家庭’的外衣，冠以‘爱’的名义，其本质仍是暴力，是伤害，是违法犯罪……不幸的童年需要用一生来治愈，爸爸因暴怒而变形的脸，随时可能失去妈妈的恐惧，不该是孩子童年的记忆，用爱与温暖呵护成长，才是你作为父亲的责任……经此一事，希望你能心存戒畏，行有所止。朝过夕改，君子与之，反之，如果你刑满释放后，再次视法律如儿戏，违反禁令，必将受到铁腕惩治，绝不姑息！”

法官释法

人身安全保护令从来都不是一张轻飘飘的纸，而是厚重的裁决、坚实的护卫，一旦作出，必须得到尊重和执行。2022 年 8 月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明确规定，被申请人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可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定罪处罚。张某无视法院发出的人身安全保护令，对前妻屡屡施暴、恐吓，必然受到严厉处罚。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裁判的价值在于执行，保护令需要长出“锋利的牙齿”，才能啃下家庭暴力的“硬骨头”！

➡ 案例评析

孤寡老人遗产管理人案牵出“人间佳话”

法制日报 2024 年 3 月 9 日 记者：丁国锋

三兄弟无私照顾聋哑老人到离世 法院判决充分肯定其行为

孤寡老人遗产管理人案牵出“人间佳话”

一处建于 20 世纪 80 年代的住宅，狭小的客厅里摆放一个老式江南人家常见木质碗橱和筷箸笼，壁橱里竖着几个酱醋瓶，沿窗的灶台上杂乱放着几个大小不一的电饭煲。房屋南面的卧室有几件老式家具，储藏室里则堆着几个衣柜和皮箱……

这是《法治日报》记者近日走进江苏省太仓市老城区实小弄 13 号看到的一番景象。这处老房子里，还藏着一个三兄弟多年无私照顾一位没有血缘关系、无儿无女的聋哑老人杨师傅的感人故事。

2021 年 1 月，杨师傅病故，其身后事都是由三兄弟办理的。实际上，杨师傅的姐姐在离世前也曾得到三兄弟照顾，其身后事也是由三兄弟办理的。如今，三兄弟照顾杨氏姐弟终老的故事，在这个江南小城已经成为邻里乡亲口耳相传的佳话。

杨师傅去世后，其“沉睡”在坊间的遗产如何处分？在经过多方了解得知民法典设立了遗产管理制度后，2022 年 7 月，三兄弟向法院申请指定太仓市民政局为杨师傅的遗产管理人。太仓市人民法院对该案进行审理后，根据特别程序作出民事判决。2023 年秋，太仓市民政局积极履职管理，清点杨师傅遗产，并协助将这处房屋过户登记至三兄弟名下。

受访专家认为，判决准予三兄弟作为利害关系人申请指定遗产管理人，有利于弘

扬文明、和谐、诚信、友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也是“孝悌忠信”中华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的淳朴再现，更让该案成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司法领域不断弘扬的鲜活案例。

组织上给予安排照顾

三兄弟负责晚年生活

杨师傅出生于 1930 年，是一名聋哑残疾人，命运多舛的他父母早亡，和姐姐相依为命共同居住在这处“旧公房”里，姐弟俩均未成家，膝下无儿无女。

十年前，杨师傅的姐姐因病去世，留下唯一的遗言是：弟弟孤身一人，时时放心不下，盼望组织上给予安排照顾。

令人欣慰的是，杨师傅的姐姐所在单位太仓市总工会，在她去世的当天就在社区召开座谈会，讨论安排杨师傅的日常起居事宜。当时，杨师傅儿时乳母的三个孙子——顾氏三兄弟，现场接受了杨师傅的选择和指认，答应好好照顾他的晚年生活。

自那时起，“长一辈”的杨师傅被顾氏三兄弟当成了父亲一样照顾，直到他以 90 岁高龄去世。

“杨师傅身体还算好的那阵子，邻里街坊都知道，只要他呆呆地站在弄堂口，就是在等老顾他们来送饭了。”和记者说这番话的，是已经在社区干了十多年的府东社区居委会副主任朱晔，“他们两家发生的点点滴滴，年龄稍大的居民可以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传为佳话。”

“我们社区专门将案件情况和杨师傅姐弟俩的材料整理了这么厚厚一本。杨师傅的姐姐杨碧梧，档案里显示的工作时间是 1949 年 5 月，是一名离休老干部。”府东

社区党委书记沈秋艳对记者说，杨师傅是一名聋哑人，聋哑人普遍对外人比较警惕，但他对老顾三兄弟完全信任。

社区干部口中所说的“老顾”，就是顾氏三兄弟中的老二顾某芳，得知记者来采访，他早早在杨师傅生前的住宅门前等待，热情地将记者迎进了家门。

记者发现，家中的灶台上有四五个电饭煲。“因为杨师傅是聋哑人，他姐姐担心家中动火会发生危险，所以只让他用电饭煲煮饭、煮菜。”老顾指着灶台上的电饭煲对记者说，“炖肉还行，要是炒菜，就没法做了。”

“他姐姐去世后，我们三兄弟就商定，让他每周末坐公交车到我家吃饭，吃完饭我开车送他回家，顺便再带点他喜欢吃的饭菜。”老顾因为会开车，成为了照顾杨师傅的“主力”。

“后来发生一件事，让我们很担心。”老顾回忆说，有一次，杨师傅因没赶上公交车，就自己招手叫了辆出租车，因为交流不畅，司机走错了方向，将他送到几十里外的昆山市花桥镇。无奈之下，司机把他送到派出所，民警想办法联系上老顾。“我女儿开车去昆山接他，他见到我女儿时都哭了出来。此事之后，我们考虑到他年龄大了，不让他来回跑了，我们每周去看他。”

于是，每周日上午 9 点，顾氏兄弟风雨无阻去杨师傅家送菜送饭。“有时候迟到一会儿，就能看到他站在弄堂口等我们，只要看到我的车，他立马眉开眼笑。”

民法典新设遗产管理

法院据此指定管理人

2017 年 9 月 24 日，老顾像往常一样给杨师傅送饭菜，到家推门进去时却发现杨

师傅倒在了地上。老顾赶紧叫了 120 救护车，把杨师傅送到医院抢救。经诊断，杨师傅大面积脑梗塞，导致肢体活动不利，生活不能自理。于是，杨师傅出院后，三兄弟安排他住进了康复医院治疗。

“杨师傅在康复医院整整住了 38 个月，虽然养老金每月有 3000 多元，医保能报销一部分治疗费，长期护理险能报销一部分，但实际上我们每个月都添进去不少钱，像日常需要的尿不湿、营养米粉等，都是买了送过去的。”老顾说。

因为放心不下杨师傅，三兄弟中的老大、老二几乎隔一天就去探望，医院的医护人员背地里都称赞，亲儿子也很难做到探望得这么勤快。

记者采访了解到，顾氏三兄弟家庭条件不错，但都年事已高，老大顾某元 78 岁，老二顾某芳 70 岁，老三顾某其 62 岁。

记者翻阅杨师傅的病例资料发现，多年来的住院费预缴单据厚厚一沓，上面每一张都有顾氏兄弟的签名。老顾说：“我们两家虽然没有血缘关系，但这么多年了感情很深，他们姐弟俩都没成家，老了确实应该得到照顾，我们就是尽了本分而已。”

顾氏三兄弟其乐融融的家庭氛围，是杨师傅最喜欢的。每年春节顾家拍“合家欢”照片，杨师傅几乎都站在 C 位。对这个大家庭，杨师傅也倍感珍惜，他在每一张照片背面都歪歪扭扭地写上了拍照的时间、地点和每个人的名字。“他在照片后面写字，是他去世后，我们整理遗物时才发现的，这让我们都很感动。”老顾说。

2021 年 1 月，杨师傅在康复医院病故，三兄弟按照当地风俗为他办理了丧葬事宜。每逢清明节等重要时节，顾氏三兄弟都会去祭拜。

原本，顾氏三兄弟与杨师傅姐弟之间的故事就此画上了句号，随着时间而湮灭在尘世间。谁想到，随着 2021 年 1 月 1 日起正式施行的民法典，这段故事有了续篇……

2022 年 7 月 1 日，在经过多方了解得知民法典新设立了遗产管理制度后，顾氏

三兄弟向太仓市法院申请指定太仓市民政局为杨师傅的遗产管理人。申请书中认为，杨氏姐弟为孤寡老人，无遗产继承人，因申请人与实小弄该套房产有利害关系，依据民法典第 1145 条之规定，继承开始后没有继承人的，由被继承人生前住所地民政部门或者村民委员会担任遗产管理人。

“这个案件的特殊性在于，杨师傅去世后的一段时间，恰逢全社会都在积极学习和宣传民法典这部社会生活尤其是民事权利方面的百科全书，让‘沉睡’在小巷子里的这套杨氏姐弟遗留下来的房子的归属问题有了新的解答方式。”承办该案的太仓市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庭长王坤说。

审理过程中，承办法官多次前往杨师傅所在社区调查核实相关情况，顾氏三兄弟作为申请人，也向法院递交了 2014 年 7 月 11 日杨师傅亲笔书写的委托书以及 2018 年太仓市总工会、府东社区居委会出具的杨氏姐弟相关情况说明等。

太仓市法院经审理认为，民法典第 1146 条规定，利害关系人有权向人民法院申请指定遗产管理人，此处“利害关系人”应当指与遗产有利害关系的人。本案中，顾氏兄弟三人与杨师傅无血亲和姻亲关系，没有赡养的法定义务，也不存在继承关系，但多年来一直照顾杨师傅的晚年生活，对杨师傅的起居、医疗极尽照料，多年的陪伴也给了杨师傅精神上的慰藉。在杨师傅去世后，三人负责其全部丧葬事宜并按照风俗祭拜。

法院认为，顾氏兄弟三人对杨师傅进行了事实上的扶养，属于民法典第 1131 条规定的“对被继承人扶养较多，可以分给适当的遗产”的人，也应当属于民法典第 1146 条规定的有权申请遗产管理人的“利害关系人”。

2022 年 12 月 7 日，太仓市法院作出民事判决，指定太仓市民政局作为杨师傅的遗产管理人。判决书中认为，准予三兄弟作为利害关系人申请指定遗产管理人，有利

于弘扬文明、和谐、诚信、友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善举符合民法典精神

司法裁判引领价值观

太仓市法院还在判决书中对太仓市民政局担任遗产管理人后的职责予以明确，赋予其包括清理遗产并制作遗产清单、向继承人报告遗产情况、处理被继承人的债权债务、按照遗嘱或者依照法律规定分割遗产等六项职责。

2023 年 8 月 24 日，太仓市民政局依据法院判决书，对杨师傅的遗产进行了分割，其中位于实小弄 13 幢的面积为 79.76 平方米的住宅及自行车库等归顾氏三兄弟所有，三人各得其三分之一；杨师傅名下银行账户内余额 2398.89 元归三兄弟所有，三人各得其三分之一；如杨氏姐弟俩对外应付债务，也由顾氏三兄弟在分得上述遗产范围内按各自三分之一承担归还责任。

一个月后，在太仓市民政局的协助下，此处房屋被过户登记至三兄弟名下。

“这个案件之所以结局圆满并且受到各方面关注，主要是该案的诸多因素，包括相关证据和情节与立法精神十分契合。”王坤举例说，顾氏三兄弟风雨无阻地照顾杨师傅十几年，却没有去提醒、鼓动或者变相要求杨师傅立下处置其房产的遗嘱，仅就这一点就十分清晰地证明顾氏三兄弟的善举，没有任何可以指摘或者质疑的瑕疵。

“没有任何血缘关系，不是亲人却胜似亲人，该案体现了苏州人文荟萃、民风淳厚的善良风俗。”太仓市法院院长张晓江认为，顾氏三兄弟自身家庭条件也都是小康生活，多年来不计报酬关心杨师傅，尤其在他最后几年住院期间依然无怨无悔，其中还包含着重承诺、守信用的美德，难能可贵。

“顾氏三兄弟对残疾孤寡老人多年悉心照料之举引领了社会道德风尚，法律应当对此弘德扬善之举给予正面评价。”全国人大代表、太仓万方国际码头有限公司营运操作部门机班副大班长褚锋认为，该案的裁判有效防止了逝者财产陷入无人管理的困境，符合民法典遗产管理制度的立法精神。

“本案中三位申请人尽管和孤寡老人之间没有任何血缘关系，但是多年来一直照料该孤寡老人直到其病故。法院判决准予三位申请人作为利害关系人申请指定遗产管理人，有利于弘扬文明、和谐、诚信、友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院长方新军认为，本案通过援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非常好地实现了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意旨，实现了不断提升人民群众对司法裁判的满意度、以司法公正引领社会公平正义的理念。

“本案结合遗产酌给制度，正确适用遗产管理人产生规则，准确认定顾氏三兄弟申请人的法律地位，为解决孤寡老人遗产无人管理问题提供了行之有效的路径，彰显出法治在调节社会关系、维护社会秩序上的基石作用。”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院长于飞评价说，本案还体现了老龄化社会环境下我国司法机关对老年人权益的特殊关怀，向社会传递了“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好人好报”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理念。

“随着社会老龄化趋势加剧，遗产继承案件也呈现了复杂化，遗产无人管理、继承人难以妥善管理甚至无法管理的情况时有发生。”王坤还建议完善遗产管理制度，保障遗产的完整性和安全性，公平、有序地分配遗产，同时坚决打击以变相骗取遗产继承权为目的的欺诈、虐待甚至伤害失能失智老人的违法犯罪行为。

最高院：夫妻一方频繁转账给另一方，并不能就转款原因和款项性质作出合理解释的，应认定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

最高裁判解读微信公众号 2024 年 3 月 25 日

裁判要旨：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金额大，笔数多，时间跨度长，且双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存在购置巨额资产和共同经营的行为。同时，在双方离婚前的一段时间内，夫妻一方频繁转账给另一方，并不能就转款原因和款项性质作出合理解释的，应认定案涉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由夫妻双方承担共同还款责任。

案号：（2022）最高法民申 425 号

裁判理由：

甲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金额大，笔数多，时间跨度长，甲和乙在婚姻存续期间购置巨额资产，且乙自认之前与甲共同经营小贷公司。根据生效的（2019）云 05 民终 873 号判决所涉甲的中国人民银行个人活期账户交易明细可知，甲自 2017 年 2 月 21 日至离婚前（2018 年 9 月 19 日甲、乙离婚）分多笔向乙转款 500 多万元，本案乙对甲该段时期为何转款给她及款项的性质均不能作出合理解释。

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原审认定案涉债务为甲与乙夫妻共同债务，由甲与乙承担共同还款责任，并不缺乏依据，适用法律也无不当。

法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零六十四条 夫妻双方共同签名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认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以及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

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但是，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

➡ 裁判实务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涉未成年人食品安全司法保护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法院微信公众号 2024 年 3 月 15 日 编辑：平钰骁

未成年人食品安全关系未成年人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党和国家历来高度重视，社会公众高度关注。多年来，人民法院严格落实未成年人食品安全司法保护，深入贯彻未成年人保护法、食品安全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法律法规，将特殊、优先、双向、全面司法保护未成年人的政策理念贯彻到各个审判领域，强化与相关部门协作配合，为未成年人筑起食品安全屏障。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一个案例胜过一打文件”。为充分发挥典型案例的评价、指引功能和警示、教育作用，最高人民法院此次发布四起涉及未成年人食品安全司法保护的典型案例。这四起案例主要有以下特点：

一是事关未成年人日常食品和校园就餐安全。四起案例中，有三起涉及未成年人的日常食品，另一起涉及校园配餐，与未成年人日常生活、身体健康息息相关，意义深远。对这些发生在未成年人食品安全领域，贴近未成年人日常生活案件的精准裁判，是人民法院发挥未成年人刑事、民事和行政审判职能，严格落实有关未成年人食品安全法律规定，坚持依法从严惩处的立场，贯彻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的生动实践。

二是体现对侵害未成年人食品安全违法犯罪从严惩处的精神。向未成年人食品领域违法犯罪行为果断亮剑，对于维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推动形成良好社会环境具有重要意义。例如，案例一是超范围添加食品添加剂的案件，消费者要求十倍惩罚性赔偿，法院判决予以支持。案例三是销售过期奶制品牟取利益的案件，大量过期食品流入市场，涉案金额大，最终被法院判处销售伪劣产品罪，追究刑事责任。对违法、犯罪行为依法从严惩处，彰显了人民法院从严从重打击侵害未成年人食品安全违法犯罪行为

的坚定决心。

三是聚焦人民群众普遍关注问题。案例的选取着眼于社会普遍关注的涉及未成年人食品安全的多发案件或典型案件。例如，案例二是销售者虚假宣传孕婴用品的案件，消费者受骗后提起诉讼，法院最终认定销售者属于以虚假或者引起误解的商品说明方式销售商品，构成欺诈，判决支持三倍惩罚性赔偿。案例四是涉及校园食品安全的行政纠纷案件，违法经营的食物导致 18 名学生发病，人民法院依法支持行政机关对违法经营食品企业予以严惩。这些案件为人民群众普遍关注。人民法院积极回应社会关切，对违法行为依法严惩，有利于净化市场，推动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未成年人食品安全治理格局。

集中发布这些典型案例，一方面是为了彰显人民法院坚持依法严惩各类危害未成年人食品安全违法犯罪不手软、坚持依法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不松懈的鲜明立场和坚定决心，另一方面也希望进一步提升食品生产者、经营者以及公众的法律意识和食品安全意识，推动全社会构建食品生产经营健康发展秩序，共同努力为未成年人安全、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的法治和社会环境。

下一步，针对涉未成年人食品安全问题，人民法院将重点开展以下三方面工作：一是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进一步融合贯通涉未成年人刑事、民事、行政审判职能，全方位加强未成年人食品安全司法保护。二是加强与行政主管部门的沟通协作，畅通沟通渠道、健全协作机制，形成依法惩治食品领域违法犯罪行为的合力。三是加强食品安全和法律知识宣传，推动食品生产者、经营者及公众提升食品安全和法律意识，规范涉未成年人食品生产经营活动，用法治利剑守护未成年人食品安全。

案例 1

李某诉某乳业公司产品责任纠纷案

——超范围添加食品添加剂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消费者有权要求十倍惩罚性赔偿

基本案情

2019 年 5 月 18 日、5 月 19 日，李某购买某乳业公司生产的固体饮料 18 罐，单价每罐 328 元，共计 5904 元。该产品配料表上标注：葡萄糖浆、植物脂肪粉、氨基酸等配料。其中，氨基酸括号内标注有 L-赖氨酸、L-蛋氨酸、L-色氨酸、L-酪氨酸等成分。李某认为 L-赖氨酸、L-蛋氨酸、L-酪氨酸、L-色氨酸等 4 种氨基酸允许使用的食品类别中不包括固体饮料，案涉产品构成超范围添加，诉请某乳业公司退回购物款 5904 元并承担 10 倍货款赔偿。某乳业公司抗辩认为，案涉产品中标示的 L-赖氨酸、L-蛋氨酸、L-酪氨酸、L-色氨酸系氨基酸复合物，是通过特殊工艺即蛋白质加酶制剂水解而成，系以改性形式存在而非添加的物质，配料表相关表述和食品安全符合国家标准。

裁判结果

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营养强化剂使用标准》（GB14880-2012）规定，L-赖氨酸允许使用的食品类别不包含固体饮料，但案涉产品系蛋白固体饮料，并非可以添加上述氨基酸的食品。某乳业公司作为食品生产者，未能举证证明另外三种氨基酸能够用于非特殊膳食用食品和其化合物来源，未能举证证明该三种氨基酸能够用于案涉食品，应承担对其不利的法律后果。原告李某购买 18 罐固体饮料的行为符合当地生活消费购买习惯，某乳业公司作为生产者，生产的产品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营养强化剂使用标准》的规定，法院判决其支付十倍货款的惩罚性赔偿金 59040 元。

典型意义

食品安全是重大的基本民生问题，特别是婴幼儿食品安全事关千万家庭，国家对婴幼儿食品安全制定了严格的标准。本案例涉及婴幼儿最常见的配方粉固体饮料，通过明确固体饮料中氨基酸属于超范围添加进而影响食品安全，判决生产者支付十倍惩罚性赔偿金，彰显了人民法院保护婴幼儿食品安全的坚定决心，也为同类案件提供参考。

案例 2

颜某诉某孕婴用品店买卖合同纠纷案

——销售者虚假宣传，消费者有权要求三倍赔偿

基本案情

颜某因女儿喝普通奶粉过敏，自 2018 年 4 月起在某孕婴用品店购买某产品作为奶粉的替代品。2020 年 5 月 14 日颜某再次到某孕婴用品店购买该产品，询问某孕婴用品店的经营者关某该产品的性能，关某明确表示该产品能“调节过敏体质”。颜某对此进行了录音录像。后颜某向当地市场监督管理局进行举报，称某孕婴用品店宣称商品能调节过敏症状，既构成虚假宣传行为，又构成引人误解的宣传行为，已造成举报人的误解，导致其购买并长期给孩子使用固体饮料。2021 年 7 月 23 日，市场监督管理局作出某市监处字[2021]第 108 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以某孕婴用品店构成虚假宣传为由，责令某孕婴用品店停止违法行为并处罚款 30 万元等。后颜某起诉至法院，要求某孕婴用品店退还价款并支付惩罚性赔偿金。

裁判结果

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的规定，生产经营者对其提供的标签、说明书的内容负责；食品广告的内容应当真实合法，不得含有虚假内容，不得涉及疾病预防、治疗功能；食品生产经营者对食品广告内容的真实性、合法性负

责。我国对特殊食品有更严格的监管规定。因此，无论是普通食品还是特殊食品均不得涉及疾病预防、治疗功能的宣传。某孕婴用品店故意以“调节过敏体质”的说辞误导消费者，属于以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品说明方式销售商品，构成欺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的规定，消费者有权要求按消费金额的三倍赔偿。遂判决某孕婴用品店退还货款并向颜某支付价款三倍惩罚性赔偿金 54624 元。

典型意义

婴幼儿食品直接关乎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现实生活中，存在虽然产品质量合格但销售者虚假宣传的情形。本案中，销售者宣称售卖的固体饮料能够调节过敏体质，误导消费者，会给婴幼儿身体造成损害。此类行为在当前侵害未成年人食品安全行为中具有典型性，该案判决对遏制虚假宣传，倡导诚信经营，推动构建食品生产经营健康秩序，具有重要意义。

案例 3

被告人靳某销售伪劣产品案

——篡改生产日期销售过期奶制品，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基本案情

2021 年 3 月至 2021 年 11 月，被告人靳某为牟取非法利益，通过欧某大量收购超过保质期的奶制品，并利用其作为经销商的便利，在内部经销商网挑选可在市场售卖的批号，在某省某地设立加工窝点，组织贺某、贺某某、高某及吴某（均另案处理）等人通过喷涂篡改产品原生产日期和批号冒充新日期产品后，销往个别省份。经统计，靳某向经销商等销售过期奶制品，已销售金额 272142 元、未销售货值 23498 元。其

中，扣押在案的部分产品经生产厂家比对认定为被篡改生产批号和日期产品，导致溯源不能。检察机关指控被告人靳某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

裁判结果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靳某结伙将他人生产的超过保质期的奶制品以更改生产日期、保质期、改换包装等方式销售牟取利益，已销售金额 272142 元、未销售货值 23498 元，其行为已构成销售伪劣产品罪。靳某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系主犯。被告人靳某犯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违法所得予以没收。

典型意义

未成年人食品安全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焦点。销售超过保质期的奶制品，具有较高的食品安全风险和社会危害性，为食品安全法明令禁止，构成犯罪的，应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本案被告人为牟取非法利益，利用身为奶制品经销商的便利，结伙收购、倒卖超过保质期的奶制品，涉案金额大，影响范围广，法院对其依法定罪判刑，体现了对危害儿童食品安全行为绝不姑息的态度，有利于规范涉未成年人食品经营活动，为未成年人成长提供食品安全保障。

案例 4

某餐饮管理公司诉某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案

——给学校提供受污染午餐，法院支持行政机关依法严惩

基本案情

某餐饮管理公司向某市共计 9 所中小学校提供午餐。2020 年 9 月 3 日共提供午餐 11887 份，每份午餐价格为 10 元。2020 年 9 月 4 日，当地市场监督管理局接到多起

报案线索，称 9 月 3 日就餐结束后，多所学校多名学生出现了腹痛、腹泻症状而被紧急送医。市场监督管理局立即会同有关部门到该公司的经营场所现场调查，发现某餐饮管理公司在上述学校午餐的存储、加工、配送过程中，存在员工裸手取食烹煮食物、未及时洗手消毒或更换清洁手套、传菜过程中食物堆叠、常温供餐时间过长等违规操作情形。经某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讨论分析认定，本案中涉及食用某餐饮管理公司配餐导致感染的中小学生共计 18 人，类似病症是因食用了受污染午餐导致的聚集性食源性疾病。市场监督管理局在法定期限内，经法定程序调查后，于 2021 年 7 月 12 日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认为某餐饮管理公司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第五十四条第一款及《学校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管理规定》第四十条第一款之规定，构成了经营污秽不洁食品、未按要求进行食品贮存、未按要求留样的违法行为，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百三十二条及《学校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管理规定》第五十六条之规定，责令某餐饮管理公司立即改正违法行为，给予警告，罚款 1901920 元。某餐饮管理公司对处罚决定不服，诉至人民法院。

裁判理由

法院经审理认为，市场监督管理局在案发后立即对某餐饮管理公司的经营场所进行了现场调查，询问了相关生产经营情况，同时调取了生产经营中的操作监控视频，查明某餐饮管理公司在存储、加工、配送午餐过程中存在操作不规范情形。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作为专业机构，同时对案涉食品事件开展了流行病学调查及实验室检测，并出具了《关于某区学生聚集性食源性疾病的结案报告》，对本案聚集性食源性疾病的原因及可疑食物污染来源予以查实，得出本次疾病系一起因食用了受污染午餐导致的聚集性食源性疾病的结论，餐次为 9 月 3 日午餐，致病因子是副溶血性弧菌。因此，市

市场监督管理局认定某餐饮管理公司配送的午餐为污秽不洁食品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同时处罚适用法律正确、量罚适当、程序合法。遂依法驳回了某餐饮管理公司的诉讼请求。

典型意义

近年来，关于中小學生配餐引发的食品安全问题时有发生，引发家长和公众担忧。本案系一起典型中小学食品安全事件。市场监督管理局在有关政府部门配合下，对涉事食品生产企业的生产、储存、配送各环节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调查，并依法进行处罚。人民法院对行政处罚行为依法予以支持，对危害学生身体健康的行为坚决说“不”。人民法院通过依法公正履行审判职能，推动形成各方履责，齐抓共管，合力共治的工作格局，规范食品生产企业的生产经营秩序，守护中小學生“舌尖上的安全”。

继承人曾口头表示放弃遗产后又起诉要求继承，如何认定？

上海宝山法院微信公众号 2024 年 3 月 18 日 作者：民事审判庭 周羚敏

女儿在母亲去世前后，向其他姐弟口头表示放弃继承，又起诉要求行使继承权，口头放弃继承的效力应当如何认定？女儿能否取得遗产份额？近期，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宝山区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遗产继承纠纷案件。

案情回顾

王老太与顾大爷育有三名子女，长女顾大妹、二女顾二妹和三子顾三强。顾大爷过世后，王老太主要与顾大妹一起生活，由顾大妹负责照料王老太起居，顾三强负责保管由王老太卖房所得的“养老基金”。兄弟姐妹三人曾签署协议约定，母亲去世后若“养老基金”尚有存余，由三人按比例进行分配。

2023 年 2 月，王老太过世。王老太名下剩余 40 万余元的“养老基金”以及 3 万余元银行存款，顾二妹认为前述财产属于王老太的遗产，应属于兄弟姐妹三人共有，于是将顾大妹、顾三强诉至宝山区人民法院，请求继承分配王老太的遗产，并请求分配丧葬补助金、抚恤金。

庭审中，被告顾大妹、顾三强共同辩称，剩余“养老基金”以及其他银行存款应当由顾大妹所有。因为生前母亲主要和顾大妹一起生活，顾大妹尽到了主要赡养义务。且顾二妹在母亲去世后曾表态过放弃继承，有当时录音为证。

针对二被告对自己曾表态放弃继承的辩称，原告顾二妹表示，录音不能真实反映自己的意愿，所谓的表态是当时在和被告进行沟通协商的一部分，此后，自己也及时明确地表示过不愿意放弃继承。

宝山区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根据法律规定，继承开始后，继承人放弃继承的，应当在遗产处理前，以书面形式作出放弃继承的表示；没有表示的，视为接受继承。该

案中，顾二妹未就放弃继承王老太的遗产作出过正式书面表示，故不应视为其放弃继承权。最终剩余“养老基金”应当按三名子女签署协议所约定比例进行分配。对于王老太名下的其他银行存款等遗产，考虑到顾大妹多尽赡养义务，应当酌情予以多分。对于扣除丧事花费后多余的丧葬补助金和抚恤金，参照法定继承分配原则，结合王老太生前与原、被告的生活状况、情感亲密程度等因素进行酌情分配。

综上，宝山区人民法院依法判决被告顾大妹、顾三强向原告顾二妹支付各类遗产款项、剩余丧葬补助金及抚恤金共计十余万元。

判决后，原、被告均息诉服判。当事人已按照生效判决履行给付义务。

法官说法

一、放弃继承权应如何作出？

放弃继承权涉及到继承人的重大利益，应当以明示方式作出。我国《民法典》规定，继承开始后，继承人放弃继承的要以书面形式作出表示。除了继承人在诉讼中可以口头放弃继承，其他情况均应书面表示。继承人在诉讼中向法院口头表示放弃继承的，也必须要制作笔录并由放弃继承人签名。

根据禁止反言原则，在继承开始后，遗产分割前，放弃继承后又表示反悔的，一般不予准许，但有特殊情况的，法院根据其具体理由决定是否承认。遗产处理后，继承人对放弃继承反悔的，不予承认。

需要注意的是，上述书面形式不仅局限于合同书、信件、电报、传真等，以电子数据交换、电子邮件等方式呈现也应视为书面形式。

二、在继承开始前放弃继承的效力如何认定？

在继承开始前，当事人表示放弃继承的，并非放弃继承权，而是放弃继承期待权。

一般而言，继承期待权亦属于财产性权益。

继承纠纷中，当事人以继承人在继承开始前已明确表示放弃继承期待权为由，请求确认表示方继承权丧失的，法院原则上不予支持，即继承人仍有权继承；但继承人的放弃表示如果在分家析产等合意行为中作出，且涉及继承权之外的其他权利义务安排，继续享有继承权有违相关习俗并导致显失公平的，该放弃的表示对表示方产生约束力，即继承人无权参与继承相应遗产。

三、放弃继承是否需要征得配偶同意？

这一情况应当注意区分当事人所表达的意思表示是放弃继承权还是放弃继承后的遗产。

放弃继承是继承人基于特殊身份享有的合法权利，如果继承人明确表示是对被继承人遗产放弃继承的，继承权的放弃无需征得其配偶同意，故其应继承的遗产转而是由其他继承人继承，但应由该继承人出具书面放弃声明或对其放弃声明记明笔录。

如果继承人表示将其应得的遗产赠与给他人等内容的，则该意思表示应解释为接受继承，并将其所继承遗产再赠与他人。在无特别说明的情况下，因继承取得的财产属于夫妻共同财产，故继承人将其继承的遗产赠与他人前，需征得配偶的同意。

2023 年度江苏法院家事纠纷典型案例

江苏高院微信公众号 2024 年 03 月 07 日

目 录

案例 1 藏匿孩童不可取 司法令状护权益

案例 2 同居生活后分手 彩礼不宜全返还

案例 3 “闪婚”又“闪离” 彩礼酌情退

案例 4 财产申报需诚实 隐藏转移要担责

案例 5 家务价值需重视 离婚补偿调平衡

案例 6 自媒体账号有价值 分割考虑人身属性

案例 7 被监护人财产受保护 监护人擅自处分要赔偿

案例 8 打印遗嘱需谨慎 形式失范有风险

案例 9 顺位越前责任越大 义务未尽少分遗产

案例 10 伪造遗嘱转移遗产 继承人丧失继承权

案例 1

藏匿孩童不可取 司法令状护权益

【基本案情】

刘某（男）与谢某（女）婚后于 2019 年 6 月生育一女刘小某，后双方因家庭琐事产生矛盾分居。2021 年 10 月 21 日晚上，刘某擅自将刚满两岁的刘小某带走藏匿，并拒绝谢某与孩子通话、视频、见面。谢某多次向社区、妇联、派出所等相关部门求助，但刘某仍不听相关部门劝告并继续藏匿刘小某。谢某遂向法院申请人格权侵害禁令。

【裁判结果】

江苏省徐州市铜山区人民法院认为，夫妻双方平等享有和承担对未成年子女抚养、教育和保护的权利和义务。父母双方对未成年子女享有平等的监护权。谢某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及向社区、妇联、派出所反映问题的材料等足以证明其监护权正在遭受侵害，符合发出人格权侵害禁令的法定条件。遂裁定：刘某立即停止对谢某监护权的侵害。在刘某签收人格权侵害禁令的第二日，谢某见到了分别一年多的女儿。同时法院针对案件中发现的谢某情绪易失控、刘某不依法履行监护职责等情况，主动开展家庭教育指导分级干预工作，向谢某与刘某送达《家庭教育责任告知书》，要求双方签署《主动履责承诺书》并参加家长课堂，在刘某拒不履行的情况下，向刘某发出家庭教育指导令，责令其定期到法院心理咨询室接受家庭教育指导。

【典型意义】

人格权侵害禁令是申请人为及时制止正在实施或者即将实施的人格权侵权行为，或者可能造成侵害的行为，在诉前或者诉中请求法院作出的禁止或者限制被申请人实施某种行为的强制命令。人格权侵害禁令是《民法典》新创设的一项制度，其作为人格权的新型法律保护方式，将预防与救济相结合，有效避免侵害人格权行为可能造成的不可逆转的损害，为人格权保护提供了一种更高效、更便捷的保护措施。本案中，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的申请，及时发出人格权侵害禁令，保障女方监护权的同时，有利于给未成年人营造良好的成长环境。另外，法院针对双方履行监护职责情况，根据《家庭教育促进法》第三十四条的规定，主动发挥审判职能作用，配合政府及相关部门建立家庭教育工作联动机制，共同做好家庭教育工作，使《家庭教育促进法》倡导内容得到了司法保障。法院双管齐下，签发人格权侵害禁令和家庭教育指导令，全面落实了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原则，彰显了司法的温度和担当，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提供了

法治保障。

案例 2

同居生活后分手 彩礼不宜全返还

【基本案情】

贺某（男）与张某（女）于 2021 年 2 月经人介绍认识后相恋，数日后双方订婚。2022 年 1 月，贺某给付张某彩礼 12.8 万元。当月，双方举行了结婚仪式，后一直共同生活，但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2022 年下半年，双方因感情不和分手，此时张某已怀有身孕，经双方协商，张某到医院进行了引产手术，支付医疗费 5074.61 元。双方分手后，就彩礼返还问题产生争议，贺某诉至法院，要求张某返还全部彩礼。

【裁判结果】

一审法院认为，贺某按照习俗给付张某彩礼，因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故张某应返还贺某彩礼 12.8 万元，但应扣除贺某引产的医疗费，遂判决：张某返还贺某彩礼 122925.39 元。张某不服，提起上诉。江苏省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彩礼应否返还及返还比例应当结合彩礼的数额、双方婚姻状态、同居生活情况、彩礼消耗情况、双方经济状况等因素综合考量。贺某与张某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按照传统风俗习惯举行了结婚仪式并同居生活了半年多时间，且张某怀孕并引产，彩礼在共同生活中必然存在一定的支出，故贺某要求全额返还彩礼的主张不应支持。遂改判：张某返还贺某部分彩礼 7 万元。

【典型意义】

彩礼源于我国古代婚姻习俗中的“六礼”，有着深厚的社会文化基础，蕴含着对婚姻的美好期盼与祝福。给付彩礼本质上是以结婚为目的的附条件赠与行为，一旦婚约

解除则涉及彩礼应否返还的问题。《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解释（一）》第五条规定了三种可返还彩礼的情形，其中包括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情形。但现实生活中，尤其在广大农村地区，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仅办了结婚仪式即同居生活的情况普遍存在。在此期间彩礼已用于共同生活，甚至生儿育女，如果仍严格遵循司法解释的规定返还彩礼，忽略共同生活的“夫妻之实”，有违公平原则，不利于保护妇女合法权益。2024 年 2 月 1 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对彩礼返还规则进行了完善，其中第六条规定：“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 本案二审判决未机械将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作为彩礼返还的唯一考量因素，而是在充分尊重客观事实的基础上，综合考量多种因素对于彩礼返还问题作出认定，较好地平衡了男女双方的利益。

案例 3

“闪婚”又“闪离” 彩礼酌情退

【基本案情】

杨某（男）与陆某（女）于 2020 年 10 月经介绍相识。2021 年 1 月杨某给付陆某 8 万元作为结婚彩礼。2021 年 4 月双方登记结婚。2021 年 8 月，陆某以工作需要为由离开共同住所未再回去。2021 年 9 月，杨某提起离婚诉讼，同时要求陆某返还彩礼 8 万元。

【裁判结果】

一审法院认为，杨某与陆某经短暂接触后即登记结婚，婚后共同生活仅四个月，未

建立起夫妻感情，现双方均同意离婚，应予准许。杨某要求陆某返还彩礼 8 万元有事实依据。遂判决：准予杨某与陆某离婚，陆某返还彩礼 8 万元。陆某不服，提起上诉。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杨某与陆某作为新婚夫妻感情基础较弱，杨某在产生矛盾后未与陆某有效沟通交流即起诉离婚导致双方感情破裂，现并无充分证据证明陆某对于双方感情破裂有明显过错，杨某要求陆某全额返还彩礼 8 万元依据不足，陆某以双方已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且共同生活为由主张不应返还彩礼的抗辩亦不成立。综合考虑双方共同生活的时间、感情破裂的原因、彩礼数额等情形，遂改判：陆某返还杨某彩礼 4 万元。

【典型意义】

现实生活中，虽然办理了结婚登记手续但“闪婚闪离”的情形时有发生，《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解释（一）》第五条未将此种情况纳入可返还彩礼的情形之中。给付彩礼的首要目的虽然是为了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以夫妻名义互尽扶养义务长期共同生活才是婚姻当事人的最终目标。因此，共同生活时间的长短应当成为确定彩礼应否返还及返还比例的重要因素，否则在“闪离”情形下如果仅以双方已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为由不予返还彩礼，特别在给付“高价彩礼”的背景下，将使得双方利益严重失衡，甚至可能因彩礼返还问题，引发其他矛盾纠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第一款规定：“双方已办理结婚登记且共同生活，离婚时一方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一般不予支持。但是，如果共同生活时间较短且彩礼数额过高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彩礼数额、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二审判决即契合了上述规定的精神，通过适当调整妥善平衡双方利益，引导社会公众理性看待彩礼问题，让彩礼回归“礼”的本质，对

于弘扬健康、文明、节俭的嫁娶新风有重要意义。

案例 4

财产申报需诚实 隐藏转移要担责

【基本案情】

张某（男）与李某（女）登记结婚并共同生活，后李某因感情不和于 2022 年 9 月诉至法院，要求与张某离婚。案件审理中，双方均表示同意离婚，但对于财产分割未达成一致意见。2023 年 2 月，法院向双方当事人送达《夫妻共同财产申报令》，要求如实申报夫妻共同财产，并告知不如实申报的法律后果。张某申报的共同财产包括两套房屋及车库、某五金厂名下两辆汽车，且当庭确认自己提交的财产申报表内容属实。审理中，法官发现张某未申报其名下 100 万元存款及某五金厂存款，且张某的 100 万元存款已经在诉讼前被其转移。在法官要求张某解释 100 万元去向时，张某称全部用于某五金厂生产、家庭开支等，但陈述前后矛盾。

【裁判结果】

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人民法院认为，张某未如实申报并隐藏夫妻共同财产，且在庭审中存在前后矛盾、虚假陈述等情形，遂依法作出决定书，对张某罚款 5000 元，酌定夫妻共同财产按照张某占 45%、李某占 55%的比例分割。

【典型意义】

司法实践中，有时会有存在离婚案件的一方当事人隐藏、转移夫妻共同财产的情形，严重侵犯经济处于弱势地位一方当事人的家庭财产权利。2023 年 1 月 1 日施行的新修订的《妇女权益保障法》第六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离婚诉讼期间，夫妻双方均有向人民法院申报全部夫妻共同财产的义务。一方隐藏、转移、变卖、损毁、挥霍夫妻

共同财产，或者伪造夫妻共同债务企图侵占另一方财产的，在离婚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对该方可以少分或者不分财产。”至此，夫妻共同财产申报制度正式入法，离婚诉讼期间如实申报夫妻共同财产成为当事人的法定义务。对未如实申报夫妻共同财产的，不仅将面临少分或者不分夫妻共同财产的后果，构成妨害民事诉讼行为的，人民法院还可根据情节轻重采取罚款、拘留等司法强制措施，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本案中，张某在法院要求如实申报夫妻共同财产后，故意隐瞒且转移夫妻共同财产，损害了另一方的权益，且有违诚实信用原则。法院依法施行夫妻共同财产申报制度，既可以最大限度查明夫妻共同财产情况，有效节约司法资源，降低诉讼成本，更重要的是有利于敦促当事人诚信诉讼，体现了司法为民的情怀。

案例 5

家务价值需重视 离婚补偿调平衡

【基本案情】

陈某（男）与汤某（女）婚后于 2010 年 5 月生育长女陈甲，2014 年 6 月生育次子陈乙。婚后陈某因在外地工作，夫妻长期分居，自 2016 年起，汤某一直一个人承担照顾家庭和抚育两个子女的义务。2023 年 7 月，陈某诉至法院，要求与汤某离婚。汤某同意离婚，但主张其对家庭付出较多，要求陈某给付离婚经济补偿。

【裁判结果】

江苏省仪征市人民法院认为，陈某与汤某夫妻感情确已破裂，应准予双方离婚。自 2016 年起，汤某独自照顾两个子女，在抚育子女方面投入了较多的时间和精力，负担了较多的义务，陈某应给付汤某一定的经济补偿。遂判决：准予陈某与汤某离婚，陈某给付汤某离婚经济补偿 6 万元，同时对子女抚养和共同财产分割作出处理。

【典型意义】

离婚经济补偿制度在原《婚姻法》第四十条已有规定，但是以“夫妻书面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各自所有”为适用前提。基于我国传统习惯和法律制度，分别财产制在我国适用并不普遍。结婚后，一方更多地承担了抚育子女、照料老年人、协助另一方工作的家务劳动，必然会占用其获得个人收入的时间、精力和机会，甚至可能出现根本没有个人财产的情形。另一方取得财产虽然与其个人努力不可分，但由于其配偶承担了大量的家务劳动，使其能够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工作中，因此其财产的取得实际上亦与配偶的奉献密切相关。在此情形下，如果离婚时完全按照约定财产制对财产进行处理，势必对承担较多家务劳动而个人财产较少的一方极不公平。将离婚经济补偿限于分别财产制中，导致该制度适用范围过窄，发挥作用有限，离婚时在夫妻共同财产较少或者无夫妻共同财产的情形下，为家庭负担较多义务的一方不能得到相应的财产补偿，将导致夫妻双方权利义务的失衡。《民法典》第一千零八十八条删除了这一适用离婚经济补偿的前提条件，降低了该制度的适用门槛，无论是分别财产制还是共同财产制，只要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因抚育子女、照料老年人、协助另一方工作等负担较多义务的，离婚时即有权提出离婚经济补偿，通过为其提供补偿性扶养，以平衡夫妻双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经济利益，是对贡献方从事家务劳动价值的充分肯定，也深刻践行了保护弱者的司法观念。

案例 6

自媒体账号有价值 分割考虑人身属性

【基本案情】

陈某（男）与谢某（女）五年前登记结婚。婚前，陈某经营着自己的快手账户，婚

后不久，陈某又注册了同名抖音账户，粉丝量迅速发展到了 300 多万，经营短视频自媒体账户成为其主要经济收入来源。近年来，陈某与谢某因家庭琐事发生纠纷，离婚争执让陈某无心再经营维护账户并停更一年多。诉讼中，双方均同意离婚，但对于陈某运营的 300 多万粉丝的抖音账户和 10 多万粉丝的快手账户归属和价值问题产生争议。陈某认为，两个短视频账户具有人身属性和不可分割性，一直由其负责策划、维护、经营、拍摄、设计，谢某从未参与运营，故两个账户应属于其个人财产，况且两个账户停更一年多，以后是否继续运营尚不确定，并不值很多钱。

【裁判结果】

江苏省苏州市虎丘区人民法院认为，诉争运营的抖音账户是婚后注册，快手账户的粉丝量也是婚后发展起来的。两个自媒体账户粉丝量已经达到一定数量，能够获取广告收入、平台流量收入等，带来可观的经济收益，具有财产属性，其中财产性权利和收益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基于两个自媒体账户的注册和运营都由陈某负责，具有较强的人身属性，故在财产分割时可以采取账户归陈某单独所有，由陈某给予谢某一定经济补偿的方式处理。经法院主持调解，双方均同意上述分割原则，并自行协商账户价值达成调解协议。

【典型意义】

21 世纪是互联网时代，创造出与实体财产同具有财产价值的形式多样的网络虚拟财产，涉网络虚拟财产分割的离婚纠纷也不断涌现，成为家事审判必须明确裁判规则的问题。网络空间是虚拟的，但其带来的经济价值却是真实的，如关注量大的微信公众号、抖音号、快手号等自媒体账号，能通过平台流量收入、广告引流、商品出售、直播打赏等方式带来经济收益，即便自媒体账户是由个人注册和运营的，也不能否认其夫妻共同财产的性质。自媒体账户的运营具有较强的人身属性，为不减损其价值，

分割时采取将其归注册和运营人所有而由其向另一方作出补偿的方式为宜。由于自媒体经济价值多取决于经营者本身的运营情况和市场行情,目前尚缺乏统一的网络虚拟财产价值认定标准。除如本案中双方自行协商确定自媒体账户价值外,也可以委托专业的资产评估机构进行评估,实践中影响评估价值的因素主要包括自媒体账户粉丝数、互动率、行业影响力、是否为品牌合作、既往同类型账户交易价格等。人民法院可以在资产评估报告的基础上,依法认定自媒体账户的财产价值。

案例 7

被监护人财产受保护 监护人擅自处分要赔偿

【基本案情】

2004 年李某(男)与王某(女)经法院调解离婚,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购置的一套原登记在李某名下的商品房归二人婚生子 7 岁的小李所有,双方还约定离婚后小李由李某抚养。但离婚后不久,李某便再婚,小李长期跟随奶奶在乡下生活。2015 年,高中毕业的小李开始出现精神异常情况,2019 年被诊断为“偏执型精神分裂”,并领取了精神三级残疾人证。王某作为利害关系人提出申请并委托司法鉴定,经法院判决宣告小李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并确定李某和王某为其共同监护人。离婚时约定的归属于小李所有的商品房一直未办理产权过户登记手续,王某多次催促李某协助办理过户登记,李某均以忙于生意为由拒绝。2020 年,在小李住院治疗期间李某擅自将商品房出售,并将售房款 80 余万元用于其与现任妻子的生意周转,未用于小李的治疗。王某作为小李的监护人提起诉讼,要求李某返还售房款。

【裁判结果】

江苏省扬中市人民法院认为,李某与王某离婚协议明确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购置

的商品房归小李所有，此约定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李某置小李的病情于不顾，擅自出售房屋严重损害了小李的合法权益，有违监护人的监护职责，遂判决：李某赔偿小李 80 余万元。

【典型意义】

国家为了充分保护被监护人的合法权益设立了监护制度。《民法典》明确规定监护人的职责是代理被监护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保护被监护人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以及其他合法权益等，并将“最有利于被监护人”作为监护人履行职责的基本原则，在财产监管方面强调“除为维护被监护人的利益外，不得处分被监护人的财产”。监护权既是权利更是义务，监护人不履行监护职责或者侵害被监护人合法权益的，应当承担法律责任。本案中，李某作为监护人未尽到监护职责，在小李生病后擅自处分了小李的房屋，并将购房款挪用于自己的生意周转，损害了小李的财产权益，法院依法判令李某承担赔偿责任，充分维护了小李的财产权益，也是对监护人“非利益”财产处分行为的否定。

案例 8

打印遗嘱需谨慎 形式失范有风险

【基本案情】

刘某（男）生前与赵某（女）育有刘小某等五个子女。2014 年刘某与赵某获得一套拆迁安置房。2021 年 8 月，刘某去世。刘小某因继承问题诉至法院，要求继承拆迁安置房 50%的份额。诉讼中，刘小某提交了一份刘某与赵某于 2020 年 1 月所立的打印遗嘱，约定拆迁安置房中属于刘某的 50%的份额由刘小某继承。刘某、赵某及两位见证人王某、黄某均在遗嘱最后一页签名捺印，年、月、日打印在文末，王某、黄某

在诉讼中表示未全程见证打印遗嘱的形成过程。

【裁判结果】

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认为，案涉遗嘱虽有两名见证人签名捺印，但其未见证订立及打印遗嘱的全过程，且遗嘱人和见证人仅在遗嘱最后一页签名，第一页无签名亦未注明年、月、日，故案涉遗嘱无效。遂判决：拆迁安置房中属于刘某的 50%份额按照法定继承处理。

【典型意义】

在科技设备大众化、流行化的时代背景下，以打印方式形成的遗嘱应运而生。《民法典》在原有五种遗嘱形式的基础上新增了打印遗嘱形式，作出了顺应社会大众需求的立法回应。打印遗嘱因其清晰、便捷、操作性强等优势特点被越来越多的社会公众作为表达临终遗愿的呈现方式，但基于电子技术易复制、可删改等局限性，以打印遗嘱替代传统自书遗嘱也大大加大了被伪造、篡改的风险。为了确保遗嘱能够客观、全面反映遗嘱人的真实意愿，《民法典》对打印遗嘱规定了严格的形式要件。《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三十六条规定：“打印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遗嘱人和见证人应当在遗嘱每一页签名，注明年、月、日。”首先，打印遗嘱需要无利害关系两个以上见证人见证，以达到相互监督的作用。其次，按照时空一致性要求，见证人应全程参与订立遗嘱的过程，包括遗嘱书写和遗嘱打印；最后，无论是遗嘱人还是见证人需在每一页上均签名并注明年、月、日，以此确保遗嘱的真实性、完整性、合法性。上述形式要件缺一不可。本案涉及到的打印遗嘱因其不具备严格的形式要件，不被法院认可。发布本案例旨在告知社会大众需严格打印遗嘱的条件，避免出现遗嘱被认定无效的风险。

案例 9

顺位越前责任越大 义务未尽少分遗产

【基本案情】

杨某生前结过两次婚，与第一任妻子育有一子杨小某，与第二任妻子未生育子女，但共同将第二任妻子与前夫所生的女儿江某抚养成人。江某成年后，杨某与第二任妻子离婚，杨某一直与杨小某一起生活。杨某晚年罹患重病，杨小某亦身染恶疾，父子二人日常起居开销、就医用药全靠杨某的哥哥、姐姐及侄子照顾、补贴。杨小某、杨某相继离世后，江某认为其系杨某唯一的第一顺序继承人，遂诉至法院要求独自继承杨某名下的房屋。

【裁判结果】

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人民法院认为，虽然法律规定继承开始后，由第一顺序继承人开始继承，第二顺序继承人不能继承，但法律亦规定了继承人以外的对被继承人扶养较多的人，可以分给适当的遗产，而有扶养能力和扶养条件的继承人不尽扶养义务的，应当不分或者少分遗产。杨某虽然与江某形成有抚养教育关系的继父女关系，江某有权作为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杨某的遗产，但在杨某生前江某未尽赡养义务，杨某一直由其哥哥、姐姐及侄子照顾，故杨某的哥哥、姐姐及侄子可以适当分得杨某的遗产，江某应少分杨某的遗产。遂判决：江某分得杨某名下房屋 10% 的份额，杨某的哥哥、姐姐及侄子共分得 90% 的份额。江某不服，提起上诉。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江某虽由杨某抚养长大，但江某对于患病的杨某从未陪伴照顾，未尽到子女应尽的赡养义务，一审法院根据江某、杨某哥哥、姐姐及侄子对杨某所尽扶养义务的多寡酌定各方的遗产继承份额，公平合理。遂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夫孝者，百行之冠，众善之始也。”孝为德本，孝亲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赡养父母也是为人儿女的法定义务。但现实生活中，有些子女往往在父母需要他们陪护时“百般推脱”，在继承遗产时却“当仁不让”，此种行为不仅应受到道德的谴责，更不会受到法律的保护。《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三十条第四款规定：“有扶养能力和有扶养条件的继承人，不尽扶养义务的，分配遗产时，应当不分或者少分。”第一千一百三十一条规定：“对继承人以外的依靠被继承人扶养的人，或者继承人以外的对被继承人扶养较多的人，可以分给适当的遗产。”继承人继承顺序的确定不仅仅是为了区分身份关系的亲疏，更是为了体现继承人应尽扶助义务的多寡，身为第一顺序的继承人，也是第一顺序的责任人，应承担更多的赡养扶助义务。本案裁判不仅充分肯定了家庭关系中的和谐互助行为，更体现了“不养老者少分或者不分遗产”的司法裁判理念，实现了个案裁判结果上的公平正义，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生动融入了司法裁判。

案例 10

伪造遗嘱转移遗产 继承人丧失继承权

【基本案情】

王某于 2021 年 6 月 2 日去世，由于其父母、妻子、子女均先于其离世，王某的兄弟姐妹王甲等五人成为其法定继承人。2022 年，赵某等非王某亲属持王某 2020 年 9 月 26 日书写的一份自书遗嘱，将王甲等五兄弟姐妹诉至法院，要求继承遗产。据赵某陈述，王某去世前曾得到赵某等四人照料，故写下遗嘱约定其享有的 A 房屋产权份额由王甲等五兄弟姐妹继承，B 房屋由赵某等四人继承，赵某等四人各分得银行理财款 10 万元，剩余银行理财款上缴国库。案件审理过程中，王甲也提交了一份落款时

间为 2021 年 6 月 8 日的王某自书遗嘱，约定 A 房屋由王甲继承，B 房屋由其余四兄弟姐妹继承，银行理财款由王甲继承。经法院委托司法鉴定，赵某提交的遗嘱字迹与王某本人的字迹样本为同一人所写，王甲提交的遗嘱字迹形成时间晚于 2021 年 7 月 1 日，落款处王某签名字迹与王某本人的字迹样本不是同一人所写。在王某去世后及诉讼期间，王甲多次从王某的银行卡中累计转出 60 余万元。

【裁判结果】

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法院认为，王某 2020 年 9 月 26 日所立自书遗嘱符合法律规定，合法有效。王甲提供的 2021 年 6 月 8 日的遗嘱系其伪造，为无效遗嘱。王甲伪造遗嘱后毫无悔改表现且转移王某巨额遗产，情节严重，丧失对王某遗产的继承权。遂判决：A 房屋份额由除王甲外的其余四兄弟姐妹平均继承，B 房屋由赵某等四人平均继承，银行理财款由赵某等四人各分得 10 万元，王甲将转移的王某银行理财款 60 余万元退出，连同剩余银行理财款上缴国库。

【典型意义】

遗嘱是被继承人对其生前财产分配意愿的表达，遗嘱自由权既衍生于个人财产权，又承载着被继承人的人格利益，应予充分的尊重和保障。侵犯被继承人遗嘱自由，不仅侵犯了被继承人自由处分财产的权利，也侵犯了其他继承人的继承权。《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二十五条设立了继承权丧失制度，其中第一款第四项规定，继承人有伪造、篡改、隐匿或者销毁遗嘱行为，情节严重的，丧失继承权。该项规定以尊重被继承人的意愿、保护被继承人的遗嘱自由为核心，通过对严重妨害遗嘱自由的行为苛以丧失继承资格的法律后果，规范继承人的合法继承行为，对于维护社会道德人伦和家庭伦理、维持良好的遗产继承秩序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 业务研究

遗产管理人制度的程序建构：如何指定与为何指定？——基于实体与程序交互实质性促进理论框架

《经贸法律评论》2024 年第 1 期 P59-72 作者：赵蕾

目录

- 一、问题的提出
- 二、遗产管理人制度程序建构的理论框架
- 三、如何指定：指定遗产管理人案件的规范解释
- 四、为何指定：遗产管理人制度程序建构的发展性作业
- 五、结语：迈向实体与程序交互实质性促进的遗产管理人制度

引言

遗产管理人是在继承开始后遗产分割前，负责处理涉及遗产有关事务的人。因为继承人在继承开始之后并不总是立即到位，有时其继承权并不确定，故而必须对遗产进行妥善照管。现代意义上的遗产管理人源于日耳曼时期的“指定受托人”，本质上是由不具有继承权的第三人对遗产行使管理和处分权能的一项制度。不少国家和地区的民法都承继了这项制度，规定了遗产管理人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已废止）侧重于保护继承人的利益，缺乏对遗产债权人的保护。然而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在人民群众财富不断增加的同时，财富的结构也发生了变化，很多被继承人在留下巨额遗产的同时也留下了很多需要清偿的债务。为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下称《民法典》）第 1145—1149 条新增遗产管理人制度，填补了遗产管理人角色空缺的情况，是一项实质性的进步。为了与《民法典》规定的遗产管理人制度相衔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23 年修正，下称新《民事诉讼法》）第十

五章“特别程序”新增第四节“指定遗产管理人案件”，为此类案件的审理提供了明确的程序指引，增强了规则的可操作性，有利于遗产管理人制度功能的充分发挥。本文基于指定遗产管理人案件的规定，对遗产管理人制度的程序建构进行研究，旨在解决新《民事诉讼法》实施后对此问题的理解与适用，同时回应遗产继承发展变革的时代之问。从问题意识与写作目的出发，笔者希望通过实体与程序交互的实质性促进理论框架，推动遗产管理人制度的程序建构，以求教于学术同仁。

一、问题的提出

《民法典》出台之后，《民事诉讼法》与《民法典》的协调与衔接问题成为“当前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实体法学者与程序法学者都对遗产管理人展开了研究。实体法学者以李永军、王奎国、王葆蔚为代表。其中，李永军从实体主体和程序主体的同一性切入，基于实体法上遗产“概括继承”原则否定了遗产管理人的诉讼主体地位。王奎国认为，遗产管理人独立于继承人、遗产债权人的特殊法律地位决定其规范解释的基本立场和价值取向。在此基础上，王葆蔚等提出遗产管理人制度的不明确之处可以通过规范解释的方法予以澄清，明确遗产管理人职责的开始、辞任、解任、债务清偿等问题。程序法学者以刘学在、陈杭平、马丁为代表。其中，刘学在等认为，遗产管理人根据遗产管理活动的职务关系性质而享有诉讼实施权。陈杭平提出“民诉法学界有必要对遗产管理程序展开研讨，形成实体与程序的衔接融合，为该问题的妥当解决提供方案”。马丁将遗产管理人的独立主体地位与职责综合性作为实体法对程序法的挑战，并且通过实体与程序互济消解这种挑战。

新《民事诉讼法》通过第 194—197 条，分别对人民法院受理相关主体提起指定遗产管理人案件的案件管辖、审理原则、特殊情况另行指定、裁判撤销等方面进行了规定，建立了指定遗产管理人案件特别程序。不过，这些规定是否妥当解决了指定遗

产管理人案件的主要问题，例如，“有争议的利害关系人”如何界定与判断？“申请人提交材料”包括哪些与如何审查？“有利于遗产管理”的内涵与价值指向为何？“指定遗产管理人”的裁判与效力如何认定？对于上述问题的回答，需要对第 194 条和第 195 条进行规范解释，为修改《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提供相关意见。此外，除了解决遗产管理人“如何指定”，还需要通盘考虑“为何指定”，即设立指定遗产管理人案件的制度目的——倘若无法解决遗产管理人的当事人资格问题，那么指定遗产管理人的立法目的可能面临落空的危险；倘若没有重视诉讼程序与指定遗产管理人案件的程序衔接，就无法形成整体统一、高效运行的遗产管理人制度的程序规则。

进言之，从深层理据而言，通过法律解释方法无法一一回答上述问题。一方面，解释法学对法律文本具有严重依赖性，且新制度之功效仍有待实践验证，不可能甫一面世就是完美的，这加剧了法解释的局限性。另一方面，虽然学者们都注意到遗产管理人制度的实体与程序交互视角，但是对于“为何交互”“如何交互”缺少一种实质性促进理论框架及其逻辑进路。因此，如何架构实体与程序交互的实质性促进理论框架，推动遗产管理人制度的程序建构，就成为本文的核心问题。

二、遗产管理人制度程序建构的理论框架

如何才能实现实体与程序交互的实质性促进？我们需要一个理论框架。因为理论框架是整个论文的“蓝图”，也指导着我们如何从哲学论、认识论、方法论上提出解决问题的有效途径。为推动遗产管理人制度研究的实体与程序交互的实质性促进，本文提出理论框架架构的三个维度“法理—程序—方法”，并且遵循“如何指定—为何指定”逻辑进路展开论证。

（一）理论框架的三个维度

遗产管理人制度程序建构的理论框架分为三个维度，其中实体与程序交互属于锚

定和理解问题的理论之维，非讼程序性质属于检视和分析问题的程序之维，法律解释方法属于解决和完善具体规则的方法之维。三个维度之中实体与程序交互是理论基础，决定了遗产管理人制度程序建构的理论理性；非讼程序性质是展开，决定了遗产管理人制度程序建构的程序理性；法律解释是方法，决定了遗产管理人制度程序建构的工具理性。

1. 理论之维：实体与程序交互法理

学术界尚未凝练出实体与程序交互法理的概念，但已经形成了一个初步的共识：“对民事生活的妥当规制既需要民法作用的发挥，也需要民事司法制度作用的发挥，更需要两者相互考虑、相互配合、相互补充漏洞。”实体与程序交互法理是继德国普通法末期实体法与程序法分离之后的一种“必然”。因为实体法与程序法同属私法体系，两者法律领域之界限常有交叉；“特别是实务中处理案件纠纷，法律人务必关注实体法与程序法相互间的衔接和配合，将其整体把握、予以运用，方为正途。”反之，如果一味采用实体法抑或是程序法单一角度来分析涉及实体法与程序法交叉的问题，既无法形成“体系化”的理论阐释，也无法进行“行之有效”的实践操作。《民法典》为民事纠纷的解决提供了实体法根据，但若没有民事诉讼制度和程序的配合，《民法典》将难以落地生根。换言之，“实体法基于事后、全能视角所作的规定，离不开处于场景之中、基于有限信息及理性的程序法做支撑”。因而，实体与程序交互法理的意义首先体现在对制定法进行法律解释、法律评析，按照“交互”而非“分离”去理解和解决指定遗产管理人案件的适用问题，形成一种“理论自觉”。

实体与程序交互法理既能够帮助研究者全面地认识交叉性问题的双重属性，正确地处理交叉性问题中实体法与程序法的关系，也能够帮助解释规范，展开程序建构研究。前者是指实体与程序交互研究方法能够弥补以往对于交叉性问题仅采实体法或程

序法单一角度进行研究的片面性缺陷，在交叉性问题中衡量实体法与程序法之轻重，重视实体法与程序法的互相配合。后者是指对于实体法问题涉及程序法的，即在以往实体法单一角度下进行法律解释之余，难以关注到的但又影响实体法目的实现的程序问题，实体与程序交互法理能够指引研究者进行全面考虑；对于程序法问题涉及实体法的，即在以往程序法单一角度下进行程序细化之余，难以关注到的但又需要实体法依据的实体问题，实体与程序交互研究方法能够指引研究者进行全盘关照和一体化制度设计。

由于本文以指定遗产管理人案件提起与裁判规则为根本出发点，因此在运用实体与程序交互法理对此问题进行检视时，研究视角还是会放在程序法规则如何同实体法规则相适配的问题之上。一是新《民事诉讼法》规定是对《民法典》的回应。就新《民事诉讼法》第 194 条和第 195 条而言，其原则上对应着《民法典》第 1146 条法院指定遗产管理人的规定。但案件提起与裁判规则作为程序启动与终结的前后两端，还会同《民法典》第 1145 条遗产管理人选任规则与第 1147 条遗产管理人法定职责之间有着较强的联系，因此亦应将这两条程序法规则纳入“对应”的范围，如此才能使程序法规范与实体法规范形成完整、全面的对应关系。二是程序法的规定应当有利于实体法的实施。法律只有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得以实施和落实才能真正具有活力和生命力，《民法典》只有得以实施才能真正起到规范社会生活的作用，而有效实施必须通过程序实现。《民法典》创设法院指定遗产管理人这一规则的目的在于为利害关系人在无法选任遗产管理人时提供救济途径，而与之对应的新《民事诉讼法》必须确保利害关系人依法按照程序实现救济，其中第 194 条作为案件提起规则应当为利害关系人提起案件提供明确指引和便捷服务，第 195 条作为案件裁判规则应当合理指定遗产管理人的人选，确保缘起争议得到较为彻底的解决。三是程序法可以为实体法难题

提供解决方案。对于法律规则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实体法可能出于自身固有的原因而无法尽善尽美地予以解决。例如就指定遗产管理人案件“有争议”的情形，《民法典》无法提供过于详尽的列举，此时若从实体与程序交互角度出发，便可以期待将“有争议”作为程序法意义上的提起条件来进行细化，从而解决实体法中的未尽难题。这体现出实体与程序相交互是一种通过高度协作沟通而有效化解难题的思路与视角，同第 194 条和第 195 条的非讼程序规则研究具有高度适配性，理应加以运用。

2. 程序之维：非讼程序性质

依照大陆法系通说，非讼案件是指利害关系人或起诉人在没有民事权益争议的情况下请求法院确认某种事实和权利是否存在的案件，而非讼程序是指法院用以解决民事非讼案件的审判程序。指定遗产管理人案件作为较为典型的非讼案件，理应适用非讼程序来进行审理。因为从程序定位来说，非讼程序主要是处理非民事权益争议事务的程序，不涉及实体权利义务争议的判断。在指定遗产管理人案件中，即便利害关系人对谁适合担任遗产管理人存在不同意见，这种争议也不属于当事人之间的民事实体权利义务关系争议。从程序功能来说，非讼程序主要发挥监护功能，用以预防私权争议的发生，而不以实质公平正义为主要指导原则。

对于指定遗产管理人案件的分析与解释应当遵循非讼程序的性质进行，进言之，非讼程序性质决定了其审理构造、价值功能、裁判效力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指定遗产管理人案件的非讼程序性质，决定了在对其进行规范解释与遗产管理人制度程序建构时应当遵循职权探知主义与当事人听审权平衡下的审理构造，具体体现为法院在审理指定遗产管理人案件时可以运用职权来主导案件事实与证据的调查，法院也可以不受当事人主张的事实和提出的证据的限制，即便是当事人未主张的事实和未提出的证据，法院也可以依职权调查。对于当事人之间没有争议的事实，法院也可以不作为裁

判的资料。在强调职权探知主义的同时，也要保障当事人的合法听审权，体现为当事人在负担协助义务的同时也能够获得法律在权利位面上的保障，主要包括知悉权、陈述权以及法院根据当事人陈述作出相应裁判的义务等。这一保障让非讼程序得以不再囿于职权探知的桎梏，法院能够向当事人充分阐释关键的裁判资料和观点，当事人的回应也得以成为法院斟酌考量的重要依据。

二是指定遗产管理人案件的非讼价值功能，决定了在对其进行规范解释与遗产管理人制度程序建构时应当遵循弹性效率与扩展功能。首先，弹性效率体现为非讼程序高度遵循效率取向，审级为一审终审，审限也通常较短，在审理中要求的证据证明标准也更为宽松。这是因为非讼案件通常较为简易明确，不具有强对抗性，无须深入挖掘实体民事权利义务关系，从而决定了非讼程序在设计安排上同非讼案件的特性相适应，坚持简易快速审理的原则。其次，传统非讼程序的基本功能包括监护、确认、证明及许可。但是随着非讼事件的诉讼化，即纳入诉讼程序的非讼事件增多，非讼程序逐步演变成为另外一种纠纷解决方式，成为诉讼程序的有效补充。如何发挥非讼程序的价值功能，借助其特性更加快速、有效地解决指定遗产管理人案件，成为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

三是指定遗产管理人案件的非讼裁判效力，决定了在对其进行规范解释与遗产管理人制度程序建构时应当遵循非讼裁判形式、效力以及变更的一般规律。首先，非讼裁判形式在一些国家和地区非讼程序立法规定与司法实践中并不统一，有的采用裁定形式，有的采用决定形式；新《民事诉讼法》第十五章有的采用判决形式，有的采用裁定形式，其中指定遗产管理人案件采用的是判决形式。其次，指定遗产管理人案件判决效力的研究不可避免地涉及既判力问题。对此学界争议颇大，一般认为非讼裁判通常能够产生形式确定力，而非产生真正的“不允许对该判断再起争执的效力”。最

后，非讼裁判不论采用什么形式，由于非讼事件对合目的性、妥当性裁判的达成有特别的程序要求，因此非讼裁判对法院的羁束力并不如既判力那样受到严格的约束。如果原事实关系基础存在不当，或者出现情势变更原因，可以依职权或者依申请变更裁判。这与非讼程序弹性、快速的程序特点是一致的，从而能够赋予法院与利害关系人通过变更裁判的方式应对之后出现的新情况与新问题。

3. 方法之维：法律解释方法

法律解释的主要任务不限于正确地界定法律语词的涵义，也致力于在揭示法律不足的同时提供改进意见，弥补因语义不确定而产生的“认知漏洞”，促进法律逻辑的严谨完整，维护法律秩序的内在统一，澄清法律制度的基本价值的功能与作用。因此，法律解释方法既具有法律适用的作用，也发挥价值指引的作用，理应成为理论框架的方法之维。

法律解释的方法，最早可追溯到德国法学家萨维尼（Savigny）的法律解释四要素说，当前运用最为广泛的是文义解释、体系解释和目的解释这三种方法。这三种解释方法之间并非杂然无序，也非存在一个固定位序，应有大致的规律可循。第一，无论何种解释方法，文义解释优先或目的解释具有终极意义是当前法律解释形成的初步共识。第二，文义解释与体系解释密切联系，在进行文义解释探求语词含义时，对法律的意义脉络（即条文前后关系）的关照是不可或缺的。第三，法律解释虽然是以有限理性形式展开的，但三种解释方法之间的关系仍然保留有一个开放性的适用空间，这意味着需要结合具体语境具体问题进行分析选择和评价。

针对指定遗产管理人案件进行法律解释乃遗产管理人制度程序建构的基本作业，在对其进行解释时应以文义解释为基石，辅之以体系解释和目的解释进行补充、验证。具体而言，首先，对指定遗产管理人案件规则的解释要始于文义终于文义，体系解释

和目的解释都不能超过文义解释的范围,应当按照法律语词的基本含义确认法律及事实的法律意义。其次,经文义解释后仍不能确认语词涵义时需要运用体系解释加以补充,如此,既有助于根据法律文本在法律体系上的关联探求其规范意义,也有助于维护法律体系及概念用词的统一性。遗产管理人制度的体系解释包含三个层面的内容:一是与非讼程序的内部体系一致性;二是与诉讼程序的中观体系协调性;三是与《民法典》相关内容的宏观体系协同性。最后,经文义解释和体系解释不能后,可以运用目的解释阐释法律疑义。目的解释中存在主观目的和客观目的,前者侧重立法者的实际意图,后者侧重法律本身的规范目的和社会功能。换言之,指定遗产管理人案件条文的目的解释,依然应以法律规范目的为根据,探寻立法真意。但目的解释赋予了法官相当大的自由裁量权,还应当有效融合法律规范、司法裁判观点等内容揭示客观目的,以期实现立法者意图追求的社会规范效果。如此,既可以实现对文义解释、体系解释的不足进行补充,也可以用于验证解释结果。

（二）理论框架的逻辑进路

理论框架的功能是支撑研究设计,帮助评估和完善研究目标,选择适当的方法,并确定结论可能在哪些方面存在效度不足的危险的研究设计。实体与程序交互的实质性促进理论框架为遗产管理人制度的程序建构提供了“如何指定—为何指定”的逻辑进路,从而能够层层递进去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

首先,规范解释是遗产管理人制度程序建构的逻辑起点,着重回应“如何指定”这一问题。萨维尼将解释视为一种“学术性活动,是法学的起点与基础”。法律语词常常会有一个“涵义空间”,在不同语境下具有不同涵义,而法律解释的主要任务之一乃是对法律语词的涵义予以界定。概言之,围绕指定遗产管理人案件的提起与受理规范进行解释,并且通过综合运用文义、体系、目的等解释方法获取法解释的观点,

经权衡和选择得出最佳解释结论，以期澄清已存在于制定法条文文本的概念，使之更加完善、更具规范性和可操作性。需要进行说明的是，本文将解释对象限定于指定遗产管理人案件的提起与裁判，主要是为了集中解释新《民事诉讼法》第 194 条和第 195 条，而且在进行规范解释时也会结合整个遗产管理人制度乃至其所归属的非讼程序的相关规则进行体系考察，分析指定遗产管理人案件规范背后的非讼程序法理，从而得出能够与法律体系相适应的解释结论。换言之，本文采用的是以解释“指定遗产管理人案件提起与裁判”规则，勾勒出指定遗产管理人在民事诉讼中的主要内容。

其次，当事人资格与程序衔接是遗产管理人制度程序建构的逻辑展开，着重解决“为何指定”这一问题。概言之，如果说规范解释解决的是遗产管理人制度“如何指定”的基础性作业，那么通过实体与程序赋权明确遗产管理人的当事人资格以及设计诉讼程序与指定遗产管理人案件的程序衔接，就是程序建构中解决“为何指定”的发展性作业。其中“如何指定”是“为何指定”的前提，后者是前者的承继与发展。只有解决了这两个问题，才算基本上完成了遗产管理人制度的程序建构。此外，随着遗产管理人制度的实体建构与程序建构愈加成熟与复杂，对两者进行协调与衔接亦会成为一个新的难点。

三、如何指定：指定遗产管理人案件的规范解释

实体与程序交互实质性促进的理论框架，为遗产管理人制度的程序建构提供了“实体与程序交互—非讼程序—法律解释”理论工具，也为指定遗产管理人案件提起与裁判提供了规范解释进路。本部分以法律解释方法为主线，聚焦遗产管理人制度“如何指定”这一问题，围绕新《民事诉讼法》第 194 条和第 195 条，并且结合实体与程序交互法理、非讼程序性质予以分析与解释。

（一）“有争议的利害关系人”的界定与判断

新《民事诉讼法》第 194 条第 1 款规定，指定遗产管理人案件须由利害关系人向法院提出申请。但无论是《民法典》继承编还是其司法解释，都没有对“利害关系人”进行界定。从实体法角度出发，对“利害关系”的理解，是指相关主体对于被继承人遗产的管理具有法律意义上值得受保护的利益。指定遗产管理人的主要法律效果与其说是对遗产的管理，毋宁说是为了了结以遗产为媒介而发生的财产关系。在民法意义上，财产关系可以具体表现为财产所有关系和财产流转关系，前者着眼于利益的享有而主要受民法物权制度的保障，后者着眼于利益的获得而主要受民法债权制度和合同制度的保障。因而将这一利益限缩解释为财产利益更为妥当。由此进一步推论可得，“利害关系人”的范围既包括遗嘱执行人、继承人、受遗赠人、被继承人生前所在地的民政部门或者村民委员会以及对被继承人尽了扶养义务的人，也包括遗产债权人、遗产债务人和共同经营的合伙人等。

新《民事诉讼法》第 194 条第 1 款同时规定了“利害关系人”的主体要件和对确定遗产管理人“有争议”的事实要件，对于“利害关系人”的判断标准，需要结合“有争议”的不同情形进一步明确。在文义上“有争议”是一个宽泛、开放的概念，需要诉诸法律条文之间的逻辑关系来辅助确定法律文本含义。从制度规范体系上看，该款是衔接《民法典》第 1146 条并细化案件管辖法院的规则，而第 1146 条法院指定遗产管理人规则是对第 1145 条遗产管理人选任规则的承接。根据这一逻辑，“有争议”的具体情形主要有以下三种：第一种情形是被继承人没有指定遗嘱执行人，且继承人就选任遗产管理人无法达成合意时，利害关系人向法院申请指定遗产管理人。这种情形可以进一步分为无人愿意担任（消极冲突）和继承人多人争当又不愿共同担任（积极冲突）。此外，若继承人之间已经就确认遗产管理人问题达成合意，只是希望通过向法院提起指定遗产管理人案件以寻求对该合意进行确认的，是否属于“有争议”的

情形？非讼程序具有确认之基本功能，即法院运用审判权对某种法律事实或者关系的认可。换言之，可以通过向法院提起指定遗产管理人案件对遗产管理人的资格进行确认，以便遗产管理人履行职责。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有争议”是向法院申请指定遗产管理人的一个客观事实要件，但并不是附随于界定和判断“利害关系人”是否为申请主体的必然条件。因此，应当对“有争议”作扩大解释，将其纳入第一种“有争议”情形的特殊情况予以考虑。第二种情形是被继承人指定的遗嘱执行人、经选任确定的继承人或被继承人生前所在地的民政部门或者村民委员会担任遗产管理人时，出现导致遗产权利人的合法权益受到或可能受到损害的情形，利害关系人认为其无法再担任遗产管理人而向法院申请重新指定遗产管理人。第三种情形是被继承人通过遗嘱指定遗嘱执行人担任遗产管理人时，利害关系人对遗嘱的真实性、有效性存在质疑，而不认可遗嘱执行人作为遗产管理人。基于此，指定遗产管理人案件的申请主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因继承身份关系而产生的利害关系人，此时“有争议的利害关系人”主要为继承人、受遗赠人以及对被继承人尽了扶养义务的人。另一类是因被继承人死亡前形成的财产关系中的相对人，此时主要为遗嘱执行人以及遗产债权人、遗产债务人和共同经营的合伙人等与遗产处理有利害关系的相对人。

（二）“申请人提交材料”的细化与审查

首先，新《民事诉讼法》第 194 条第 2 款对利害关系人向法院提起指定遗产管理人案件的申请材料作了一般性规定。文义上可以明确，一要提交写明被继承人死亡的时间、申请事由和具体请求的申请书，二要提交“被继承人死亡”的相关证据材料。但仅从文义解释出发并不能解读出申请材料的具体内容应符合哪些要求，还需要结合体系解释进一步细化。联系第 194 条第 1 款，一方面，在申请书的申请事由中应当对“有争议”的事实要件和“利害关系人”的主体要件作出先行、基本的交代，以便法

院进行识别与审查。另一方面，在具体请求中应当明确申请指定谁为遗产管理人，以便法院进行裁判。根据目的解释，该款条文目的是推动法院更加快速和顺利地确认谁是遗产管理人，既验证了体系解释对该款细化结果的合理性，也反映出相关证据材料仅对证明“被继承人死亡”这一事实作出规定存在不足。因此，在提交申请材料时，还应当提供能够初步证明对确定遗产管理人“有争议”以及自身属于“利害关系人”的相关证据材料，以更好地实现非讼目的。

其次，法院在接收到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后，根据第 194 条第 2 款进行形式审查并无争议，然而对于第 195 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申请后，应当审查核实”则需要解释。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法院审理特别程序的“审查核实”是指“采取职权主义审查，可有权在形成心证的基础上进行自由裁量”。其中，需要注意两点内容：第一，突出职权探知主义，即“法院对于程序的开始、结束以及诉讼对象的选定、证据的收集等事项具有主导权”。这意味着法院在审查时可以不限于当事人的材料，必要时依职权主动收集事实和调查证据。第二，确立实质审查标准。非讼程序的审理对象是对某一法律事实状态的确认，并非对双方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的实质确认。其审理方式是实质审查，法官需要对可能反映法律事实情况的相关证据查证属实后作出裁判，重点是对申请人提交证据的“三性”和证明力进行评价，对具体请求的法律依据和事实根据进行评判。换言之，在指定遗产管理人案件中，审理对象为对遗产当前适宜的遗产管理人这一阶段性事实状态的确认，不涉及遗产分割确权等权利义务的实体处分。因此，法院在审查利害关系人提交的申请材料时，应当达到使法官对确定遗产管理人这一客观法律事实状态形成内心确信的实质审查标准，以便作出判决。

（三）“有利于遗产管理”的内涵与价值判断

新《民事诉讼法》第 195 条确立了法院判决指定遗产管理人应当按照“有利于遗

产管理”的原则。“有利于遗产管理”在文义上仍然是一个不确定概念，应当由法官在具体案件中进行价值补充，即依价值判断将不确定概念和一般条款具体化。遗产管理人制度的立法目的在于“确保遗产得到妥善管理、顺利分割，更好地维护继承人、债权人利益”。对遗产管理人的确定应当朝着有利于维护利害关系人财产利益的方向发展。此外，为避免裁判的主观恣意性，应当确立两个相对客观标准“限制”法官的价值判断，以形成一套价值判断规则。

第一，遗产管理的本质是反映被继承人的意志，实现社会财富平等保护和财产代际流通。这强调遗产管理人的确定要尽可能遵循被继承人的遗愿，既涉及维护继承人、遗产债权人利益，也事关保障交易安全。第二，在新《民事诉讼法》颁布之前，指定遗产管理人案件缺乏明确的裁判依据，法院只能从具体案件出发尝试确立恰当的裁判原则，这也为法官进行价值判断提供了一个相对客观的标准。例如，在“欧某士申请指定遗产管理人案”中法院提出了“最有利于遗产保护、管理、债权债务清理的原则”，并强调要综合考虑“被继承人内心意愿、各继承人与被继承人亲疏远近关系、各继承人管理保护遗产的能力水平等方面因素”。因此，法官在对“有利于遗产管理”进行价值判断时，应着重考虑以下三个要素：一是“被继承人的可能遗愿”，应当尽可能查明并遵循被继承人关于遗产管理的遗愿。二是“遗产的最优化管理”，应当遵循有利于遗产的妥善保护、效用最大化原则。三是“利害关系人的利益”，应当遵循有利于继承人、遗产债权人和其他利害关系人利益的妥当维护原则。

（四）“指定遗产管理人”的裁判与效力

新《民事诉讼法》第 195 条规定指定遗产管理人案件采用判决形式，而非裁定或决定的形式。对于不涉及实体权利义务处分的非讼性质案件，采用特别程序来快速解决争议，是一种兼顾效率与公正原则的程序设置。相应地，追求公正在遗产管理人制

度程序建构中进一步体现为对非讼判决效力的探讨。

对非讼判决效力的理解，需要借助判决效力的相关理论。生效判决的确定力可以划分为形式上的确定力和实质上的确定力。诉讼程序中的终局判决一经生效便产生实质上的确定力，即既判力，非经法定事由与程序不得随意变更。非讼程序中的终局判决一般认为能够产生形式上的确定力，在法院发现非讼程序判决存在错误时，“通常都应当或可以予以变更和撤销”。相较于诉讼程序判决既判力的严格拘束，非讼程序判决羁束力对法院的拘束力被缓和，这是由非讼程序对判决结果的妥当性和合目的性的特别要求所决定的。根据新《民事诉讼法》第 185 条的规定，当事人对法院裁判既不能提起上诉也不能提起再审，法院也不能依职权变更或撤销裁判，故这类裁判自然应具有形式上的确定力。若经法院指定的遗产管理人存在第 196 条和第 197 条规定的特殊情形，法院须依申请才能撤销判决，依法另行指定遗产管理人。

然而，指定遗产管理人案件的非讼判决对谁产生效力，与被申请人的确定有关。对此，无论是新《民事诉讼法》还是《民法典》均未明确规定被申请人的范围为何。有学者指出，《民法典》第 1145 条规定遗产管理人的选任范围是遗嘱执行人、继承人、民政部门或村民委员会，没有兜底性规定，故法院对遗产管理人的指定应在上述主体范围内进行。笔者认同此观点，从非讼程序法理出发，形成性判决不仅对受通知的直接关系人产生效力，也对实质关系人有效，更有对世的效力。其中，“受通知的直接关系人”主要指指定遗产管理人案件的双方当事人，即申请人和被申请人。若利害关系人申请指定自己为遗产管理人，则存在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竞合的特殊情况。

“实质关系人”主要指前文所述“有争议的利害关系人”范畴。指定遗产管理人案件的判决书对于上述关系人发生效力的时间可以通过法律文书送达而确认，但“对世”如何发生效力、什么时候发生效力在指定遗产管理人案件中显得尤为重要。遗产管理

涉及众多债权人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与“认定财产无主案件”波及的利益范围相当,或可参照新《民事诉讼法》第 203 条,采取向社会发布公告的形式,并设置合理的公告时间,以实现指定遗产管理人案件判决的对世效力。

四、为何指定:遗产管理人制度程序建构的发展性作业

在“程序为当事人而设”这一基本共识之下,遗产管理人制度程序建构不能仅规定指定遗产管理人案件,而是应当根据实体法规定和司法实践的需求进行通盘考量。首先,如何解决“现实地将何人置于当事人之地位”,即明确遗产管理人是否在后续诉讼中具有当事人的资格,在程序建构中至关重要。其次,进行程序建构不得不考虑遗产管理人诉讼目的的多样与程序的多元。为了充分发挥遗产管理人的功能与作用,提高涉遗产管理相关诉讼的整体效率,在程序建构中诉讼程序与指定遗产管理人案件的程序衔接也不可或缺。如果可以在民事诉讼法中增加遗产诉讼程序与指定遗产管理人案件程序衔接的一般规则,对于遗产管理人制度程序建构将大有裨益。

(一) 实体与程序赋权下遗产管理人的当事人资格

当事人适格也被表述为正当当事人或诉讼实施权。一般而言,当事人是否适格是通过实体权利义务的归属主体来确定的。确认遗产管理人能否作为诉讼的当事人,首先要判断遗产管理人是不是实体上的直接利害关系人,如果是则获得固有诉讼实施权,如果不是再考虑新设诉讼实施权。具言之,在指定遗产管理人案件中,当遗产管理人是实体上的直接利害关系人时,即遗产管理人为继承人时,遗产管理人的当事人资格来源是固有诉讼实施权;当遗产管理人不是实体上的直接利害关系人时,即遗产管理人为继承人之外的遗嘱执行人、民政部门或村民委员会等,则需要考虑通过实体与程序交互方式新设诉讼实施权,从而根本上解决继承人之外的遗产管理人的当事人资格难题。

为继承人之外的遗产管理人新设诉讼实施权,既可以采取仅赋予其诉讼实施权的程序赋权模式,也可以采取使之成为实体权利义务归属主体的实体赋权模式,两者各自存在优势,并且存在相互衔接与转化的情形。对于继承人之外的遗产管理人的当事人资格问题,立法解释上并没有给出明确答复,理论上也存在争议。以刘学在为代表的学者主张实体赋权,认为继承人之外的遗产管理人的诉讼实施权是通过实体而非程序赋予。以王国征为代表的学者主张程序赋权,认为继承人之外的遗产管理人是通过诉讼担当的程序授权方式获得诉讼实施权。笔者吸收了上述观点,尝试提出一种实体赋权解读与程序赋权设置相配合的形式,明确遗产管理人在涉遗产管理诉讼中的地位。

首先,形式性实体权利的实体赋权解读方式获得实施权。实体赋权模式分为设定实体性实体权利义务与形式性实体权利义务两种类型。前者与民法的意思自治原则不相契合,在民事立法中本就罕见,而遗产管理人并不符合实体权利义务法定移转情形。后者是指该实体权利义务主体仅在名义上成为争议法律关系主体(不享有诉讼成果和不承担诉讼费用以外的其他败诉风险),与遗产管理人制度更为契合。《民法典》第1147条是通过新设遗产管理人的管理权,实现形式性实体权利的设定,从而赋予遗产管理人诉讼实施权。具体原因如下:我国遗产管理人享有法律明确授予的管理遗产的职责,特别是第1147条第4项规定了遗产管理人应当“处理被继承人的债权债务”,其中即包含诉讼实施之意。对于处理债权的情形,如果因债权债务纠纷在继承开始之前已经提起诉讼的,则遗产管理人应以何种身份参加诉讼,直至获得债权的确认判决?如果出现遗产债权因不及时行使有罹于时效而无法获偿情形的,遗产管理人能否以自己的名义向债务人提出偿付请求以中断时效或者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对于处理债务的情形,遗产管理人能否以自己的名义,对债权人的债权申报提起诉讼?上述

活动都是保存和处理遗产债权的必要活动，如果没有相应的诉讼实施权配置，“处理被继承人的债权债务”就容易沦为具文。因而“在第三人被授予管理权、职务上的当事人等诉讼担当的情况下，应强调以管理权作为诉讼实施权的基础”。继承人之外的遗产管理人为履行第 1147 条所规定之职责，自然可基于对争议的遗产权利或法律关系有管理权而被赋予诉讼实施权。需要说明的是，这种诉讼实施权配置的方式并不导致实体权利义务关系的变化，即继承人之外的遗产管理人不属于直接利害关系人这一基础没有改变，因此属于通过设定形式性实体权利的方式新设诉讼实施权。

其次，法定诉讼担当的程序赋权设置方式取得实施权。程序赋权系保留实体权利义务归属主体对诉讼标的享有的实体权利义务，或赋予有助于纠纷实际解决的其他主体以诉讼实施权（法定诉讼担当），或授权实体权利义务归属主体通过特定形式将其诉讼实施权移转给非实体权利义务归属主体（任意诉讼担当）。任意诉讼担当的成立前提是担当人的授权，具体到指定遗产管理案件中进行分析，可以分为以下两种情形：第一种是存在继承人且继承人并未放弃继承的情况，可以成立任意诉讼担当。此时继承人作为实体权利义务的归属主体，可以成为诉讼担当的被担当人，授权给继承人之外的遗产管理人。第二种是存在继承人但继承人均放弃继承权利以及无继承人的情况，难以成立任意诉讼担当。一方面此时或继承人放弃实体权利义务或缺少继承人，导致诉讼担当缺失被担当人，也就无法授权给继承人之外的遗产管理人；另一方面我国立法没有将遗产本身拟制为具有主体资格的财团法人，遗产管理人同样难以基于财团法人授权成为诉讼担当的被担当人。

对此，有必要通过设置法定诉讼担当的程序赋权模式，赋予继承人之外的遗产管理人诉讼实施权。此时设置法定诉讼担当的正当性在于：一是继承人之外的人担任遗产管理人意味着实体权利义务归属主体不存在或放弃诉讼实施权，这导致无法通过诉

讼代理等其他类似制度弥补实际诉讼能力；二是遗产管理人的职权是法定的，相对于怠于行使权利的实体权利义务归属主体而言更有动力与积极性解决纠纷，这无疑更有助于纠纷及时、有效解决；三是继承人之外的遗产管理人所带有的利他色彩有助于更加切实有效地实现债权人利益。

概言之，继承人作为遗产管理人时，可以较为顺利地通过固有诉讼实施权获得当事人资格，但继承人之外的人作为遗产管理人时，情况则较为复杂。尽管《民法典》第 1147 条通过设立形式性实体权利的实体赋权模式赋予了继承人之外的遗产管理人的诉讼实施权，但仍然需要新《民事诉讼法》通过设置法定诉讼担当的程序赋权模式，明确继承人之外的遗产管理人在涉遗产诉讼中的适格当事人地位。只有采取这种“实体赋权解读 + 程序赋权配置”模式，才能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回应实体赋权在理论上的争议，另一方面解决缺乏程序赋权会导致遗产管理人当事人资格在司法实践中适用不一的问题。从一种相对中观视角来看，通过程序赋权明确继承人之外的遗产管理人的当事人资格，成为接下来展开诉讼程序与指定遗产管理人案件程序衔接的逻辑前提。

（二）诉讼程序与指定遗产管理人案件的程序衔接

法律程序是按照“程序”（process）而展开的“运作”（operation）。程序在形式上的展开过程以及程序与程序之间的衔接都是程序建构研究中的重要问题。如果在程序建构之中缺乏必要的程序衔接，便无法满足纠纷的及时化解需要与当事人合法权益得到有效维护的客观要求。从当事人角度而言，缺乏程序衔接意识的制度设计很难真正发挥诉讼实施权将实体法上的管理权主体与诉讼中的当事人连接的机能。以下按照诉讼程序与指定遗产管理人案件衔接阶段的先后，分为“财产诉讼进行中”“遗产诉讼开始前”“遗产诉讼进行中”三种情况展开论述。

首先，财产诉讼进行中，出现一方当事人（被继承人）死亡，需要等待确定遗产管理人的，应当构成诉讼中止，启动指定遗产管理人特别程序。根据新《民事诉讼法》第 153 条第 1 款第 1 项，“一方当事人死亡，需要等待继承人表明是否参加诉讼的”会导致诉讼中止。但是，在《民法典》确立遗产管理人制度之后，继承人与遗产管理人都具有诉讼承继人的资格，上述处理程序亟待同步修改。笔者建议将新《民事诉讼法》第 153 条第 1 款第 1 项修改为“一方当事人死亡，需要等待继承人表明是否参加诉讼或者确定遗产管理人的”。不过，其中也存在一些具体情形，需要予以说明。一是遗产管理人是为了保护和管理遗产，保证遗产在被继承之前免受损失，保障遗产权利人权益而设立的一种制度。换言之，遗产管理人并非当然存在于每次继承之中。即如果遗产继承顺利，就不需要遗产管理人，债权人可以直接向继承人主张债权。二是继承人和遗产管理人可能存在诉讼实施权的竞合。这一情形出现在遗产管理人由继承人合意推选继承人担任时。作为遗产管理人的继承人能够以自己的名义独立成为原告或被告，但其他继承人作为直接利害关系人所享有的固有诉讼实施权并不会因此而灭失，亦享有共同提起诉讼的权利和成为共同被告的可能。这种情况如何解决，亟待后续研究予以回应。

其次，遗产诉讼开始前，如果遗产管理人并未确定，需要分情况判断指定遗产管理人程序是否为前置程序。遗产管理人“并不确定”的情形包括以下三种：没有继承人或继承人均放弃继承、没有继承人之外的遗嘱执行人以及多个继承人无法推选遗产管理人。对于没有继承人或继承人放弃继承以及没有继承人之外的遗嘱执行人两种情形，指定遗产管理人程序最好设计为一种前置程序。因为通过前置的特别程序审查，可以避免诉讼程序因当事人或第三人提出实体抗辩而不能持续进行，实际上反而有利于提升诉讼效率。对于多个继承人无法推选遗产管理人的情况，又可分为多个继承人

怠于推选与多个继承人积极推选但对于具体人选难以确定两种。无论是哪一种情况，都会产生《民法典》第 1146 条规定的“对遗产管理人的确定有争议”，即无法通过第 1145 条有效确定具体的当事人的情形。此时就有必要通过将指定遗产管理人程序作为前置程序，指定由谁来担任遗产管理人。如果没有这一前置程序，可能会导致遗产管理人的人选无法确定或悬而未决，这显然不利于遗产处理。

最后，遗产诉讼进行中，发现遗产诉讼当事人非适格当事人的，是否需要当事人进行释明，要求他们启动指定遗产管理人案件？释明程序贯彻于诉讼的始终，就遗产诉讼当事人适格问题而言，释明程序是法院对当事人双方在当事人适格这一议题上所进行的法律上和事实上的阐述、解释和指导。对此问题可以分起诉与受理以及审理两个阶段进行说明。起诉与受理阶段发现遗产诉讼当事人非适格当事人的，区分为原告不适格与被告不适格两种情况。对于原告不适格的情况，为了避免不正当当事人参加诉讼中的可能性，使得正当的当事人进行诉讼活动，法院应当对原告进行释明。如原告坚持起诉，则根据新《民事诉讼法》第 126 条的规定，应当裁定不予受理。对于被告不适格的情况，法院也应当对原告进行释明，如原告坚持不予变更被告，即当被告“不适格”时应裁定驳回起诉。审理阶段发现遗产诉讼当事人非适格当事人的，经法官释明后原告仍然拒绝更换被告的，应当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五、结语：迈向实体与程序交互实质性促进的遗产管理人制度

中国正在迎来遗产继承制度之大变革。《2022 中华遗嘱库白皮书》对 25 万余份遗嘱进行了大数据分析，从一个层面揭示了国人遗产继承观念的变化趋势。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一方面，随着不婚不育人群的增加，遗产管理人的需求会持续增多；另一方面，随着遗产的多样化与虚拟化，遗产管理人的应用场景也会持续深化，新型的、多元的、复杂的遗产管理人体系正在逐步生成。在此背景之下，如何基于实体与程序

交互实质性促进，实现遗产管理人制度的程序建构，成为当下亟待研究的重要问题。

本文提出实体与程序交互实质性促进理论框架，这个框架结合实体法与程序法交互法理，通过法律解释方法尽可能将指定遗产管理人案件全部归入非讼程序加以研究，以谋求制度的弹性效率与扩展功能，通过实体与程序赋权明确遗产管理人的当事人资格以及诉讼程序与指定遗产管理人案件的程序衔接，以确保程序的正当性和纠纷解决的实效性。从逻辑进路而言，规范解释解决的是遗产管理人制度“如何指定”的基础性作业，通过实体与程序赋权明确遗产管理人的当事人资格以及设计诉讼程序与指定遗产管理人案件的程序衔接，是程序建构中解决“为何指定”的发展性作业。按照“如何指定—为何指定”进路进行程序建构，希望能够进一步发现遗产管理人制度中实体法与程序法之间的“内在的价值关联”。

实体与程序交互实质性促进理论框架蕴含了一种体系化思维。这一体系化思维对于研究遗产管理人制度的重要性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体系涉及所有法律制度和法规则连接成一个大统一体的内在关联”。体系化要求“将既存的知识或概念，依据统一的原则安放在逻辑互相关联的理论框架中”。就上文分析来看，不论《民法典》还是新《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还尚不足以应对遗产管理人的实际需求，因此有必要逐步建立起实体与程序交互实质性促进下的遗产管理人制度，而不是仅限于对当前立法进行解释。从这个角度而言，实体与程序交互实质性促进理论框架有助于“柔化”由于法典化而可能变得过于僵硬的制度体系，使遗产管理人制度在适用过程中更具灵活性与现实感。另一方面，一项制度分支结构布局愈合理，则该制度的功能发挥就会愈流畅与充分。同理，遗产管理人制度的建立与适用都离不开体系化的发展期待，因为体系化也为制度运行提供了价值指引。不难预见，通过不断发现实体与程序之间相互关照与相互促进的“体系化”力量，逐步形成实体与程序交互实质性促进的遗产管

理人制度体系，将会成为有待深入探讨的重要课题。

扶养义务的“激活”与“过去时间的扶养费”的有限可追索性

《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24 年第 1 期 2024 年 03 月 15 日 作者：徐国栋

摘要

古罗马皇帝哥尔迪安的敕答开创了过去时间的扶养费的法律地位问题，将之降等，允许其成为和解的对象。魏多弗雷多把这一问题改造成时间错位问题，形成不诉追过去时间的扶养费构成不需要此等经济支持的表面证据的推理，以此保护扶养义务人并鼓励权利人自力更生。波坦诺明确提出了过去时间的扶养费不受追诉的原则，被至少 10 部现代民法典采用。其中，《德国民法典》对这一问题作了最明确细致的规定，它原则上不许追索过去时间的扶养费，但允许一定的例外。《意大利民法典》的德译者把父母与其未成年子女的生活保持关系排除作为过去时间的扶养费不受追索的适用对象，强调了抚养与扶养、赡养的不同，甚有道理。王利明教授负责起草的民法典学者建议稿也采用了这一规则。有了这些作为基础，我国应通过司法解释确立过去时间的扶养费不可无限追索的规则。

关键词

告 第三人扶养 禁反言

目次

一、释题

二、“过去时间的扶养费不受追索”法谚的产生和发展

三、“过去时间的抚养费不受追索”法谚在现代民法典中的体现

四、我国法上扶养义务的“激活”与过去时间的抚养费问题辨析

五、结论

一、释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第 26 条第 2 款规定：“成年子女对父母负有赡养、扶助和保护的义务。”如何理解此款？可能的理解一：子女满 18 岁后有收入的且不与父母同居共财的，每年分若干期次向父母提供定期金，不管他们是否有需要。可能的理解二：在相同的条件下，子女并无每年分若干期次向父母提供定期金的义务，只有在后者陷入困难的情况下，例如，父母一方大病、失业，子女才开始对其父母承担赡养义务。显然，第一种解释违背了扶养的成立以权利人有需要、义务人有能力的条件设定，不值得采用。第二种理解符合扶养成立的条件设定，值得采用。一旦采用了这样的理解，就意味着扶养义务和受扶养权在扶养条件成立前，都处在睡眠的状态。扶养条件的成立把两者“激活”。这样，扶养关系很类似于保证关系，在主债务人陷入支付不能前，保证人的义务处于休眠状态，其保证义务在主债务人发生支付不能后被“激活”。“激活”行为有两种可能的结果。其一，发生困境后，父母让子女知道了自己的困境，子女感受“激活”行为后开始履行扶养义务，此种可能美哉！其二，发生困境后父母实施“激活”行为时找不到其子女（在目前人口大流动的条件下，这不是不可能的），三个月后才找到，从“激活”到“找到”的这三个月期间的抚养费谓之“过去时间的抚养费”。第二种可能的结果挑起这样的问题：“激活”是只对未来生效，义务人从“激活”

时开始履行扶养义务，直到扶养条件解除或权利人死亡，还是“激活”具有溯及力；换言之，义务人也要履行过去时间的扶养费？本文拟回答这一问题。至此可见，本文标题呈现的两个问题彼此关联，“激活”是判断“过去时间”的依据，“过去时间的扶养费不受追索”的法谚把两者勾连起来，尽管“激活”被隐含在“过去的时间”的表述中，但我们仍然可以从探讨这个法谚的来龙去脉开始，并探讨用什么方式“激活”扶养义务，过去的扶养费是否需要补充履行等问题。

二、“过去时间的扶养费不受追索”法谚的产生和发展

标题中法谚的拉丁文形式是“*In praeteritum non vivitur*”，直译是“无人现在生活在过去”。这个译文显示不出该法谚与扶养费问题的关涉，所以，后人将之加工成“*Nemo pro praeterito alitur*”（任何人不能受过去时间的扶养）。新的表达建立了与扶养费的关涉，并表达了“过去时间的扶养费不受追索”（不能受过去时间的扶养）的意思，换言之，扶养费请求权过期作废。该法谚为众多国家的民法典采用，来自罗马法。

“过去时间的扶养费不受追索”的法谚降低了扶养费的神圣性，最早立法完成此等降低的是古罗马皇帝马尔库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 121-180）。他在一次对元老院的演说中说：“除非得到裁判官批准，关于扶养的和解协议无效”（*D. 2, 15, 8pr.*。乌尔比安：《论各种法院》第 5 卷）。因为被遗留扶养费的人为了获得现钱救急，非常容易满足于立即到手的很低的数额而与遗嘱人的继承人达成和解，把未来可领的大额扶养费贴现为较小数额的现金，这样的结果是饮鸩止渴，奥勒留出于法律“父爱主义”禁止他们这样做，但裁判官批准的除外。正是这个但书降低

了抚养费的“神圣性”。据此，裁判官通常介入正在缔结和解协议的人之间，决定是否以及哪个抚养费的和解应被批准。

但奥勒留的立法并未区分过去时间和未来时间的抚养费。这一区分是古罗马皇帝哥尔迪安三世（Marcus Antonius Gordianus Pius, 225-244）于 293 年对士兵优纽斯发布的一个敕答完成的，其辞曰：如果对过去时间的抚养费产生争议，可以就此进行和解；但以未来的抚养费为标的的和解，必须得到裁判官或行省总督的批准，否则视为无法律效力（C. 2, 4, 8）。这个敕答站在奥勒留立法的肩膀上，区分过去时间和未来时间的抚养费确定它们的法律地位，两者的区分界线当然是权利人提出抚养请求。对于过去时间的抚养费，哥尔迪安的敕答降低其品级，允许作为和解的标的，因为过去时间的抚养费的存在与否、数额多少，滋生争议，所以可作为和解的对象。罗马法像德国法一样，只能就有疑义的标的和尚未审结的不确定诉讼达成和解。对于未来时间的抚养费，通常不许作为和解的标的，以坚持法律“父爱主义”立场，但有高级长官批准的除外。至此可见，哥尔迪安的敕答确定过去时间的抚养费仍可主张，不过其效力较低而已，故允许作为和解的对象，因为被抚养人既然没有领抚养费也活过来了，让他剜肉补疮也不会影响他的生存。对于未来的抚养费，仍然维持法律“父爱主义”处理。相比于奥勒留的不分过去时间和将来时间的原则上禁止就抚养费和解的立法，哥尔迪安的立法是个进步，因为它体现了不同时间的抚养费对于被抚养人的不同意义，但它仍未禁止诉追过去时间的抚养费。

哥尔迪安的敕答吸引了不少后世法学家进行解释，学者们在解释中完成了对哥尔迪安规则的改进。

法国法学家狄奥尼修·戈多弗雷多（Dionysius Gothofredus, 1549-1622 年）在对哥尔迪安敕答的评注中这么说：该敕答禁止就抚养费达成和解，但允许就过去期

间相关的抚养费达成和解。因此，在与债务人达成和解时，扶养权利人可以全部或部分免除过去时间的抚养费，但不能免除债务人未来的扶养义务。为了澄清这一点，虢多弗雷多采用了“*Nemo in praeteritum vivit*”的表述。意思是“无人现在生活在过去”，这个句子表达的是一个语法上的悖论：*Vivit* 是动词 *vivere* 的一般现在时形式，而配给它的时间状语是“在过去”（*in praeteritum*），既然“生活”的动作是现在的，它怎么能与“在过去”的状语相配呢？用罗马人的术语说话，这构成时间上的颠倒。虢多弗雷多利用这个颠倒想表达“既然现在扶养权利人还活着（没有饿死），证明他不需要过去的抚养费”的意思。这个表达构成本文研究的规则的原型，它脱离了法律“父爱主义”的言说方向，转入权利失效制度的语境，力图表达扶养关系的成立之义务人有需要的条件。

在虢多弗雷多之后，曾长期担任法国南部城市尚贝里（Chambery）法院院长的安托万·法夫尔（Antoine Favre, 1557-1624）在其《法夫尔法庭用定义集成》中说：“*Nemo autem in praeteritum vivit, licet vixerit*（无人现在生活在过去，尽管他过去也活过来了）。”相较于虢多弗雷多提出的命题，法夫尔加了“尽管他过去也活过来了”这句话，此语强化了受扶养人不需要抚养费的说明。

荷兰学者约翰内斯·弗埃特（Johannes Voet, 1647-1713）对哥尔迪安敕答的解释是：*Non enim quisquam in praeteritum vivit aut alendus est*（没有任何人现在生活在过去或有受扶养的必要），意思是：权利人没有抚养费养也活过来了，证明他不需要扶养。弗埃特给虢多弗雷多创立的表达加了“受扶养的必要”短语，将虢多弗雷多的表达纳入家庭法的场域。

意大利学者波坦诺（Giovanni Battista Pontano, ? -1662）在其《论扶养的类型》一书中设专章讨论过去时间的抚养费，曰：无论是根据原始自然法，还是根据国

家的自然理性，或根据制定法，抚养费都是基于慈善负欠的，所以，法官只判令支付满足现在的和紧迫的需要的抚养费，而不判令支付过去时间的抚养费，才是公平的，所以，不应考虑还活着且未要求抚养费的人的需要。波坦诺明确抚养费的本质是好心者救急，不能成为受抚养人致富的工具，在上述作者中第一个否定可追索过去时间的抚养费者。“过去时间的抚养费不受追索”的规则至此形成。

三、“过去时间的抚养费不受追索”法谚在现代民法典中的体现

波坦诺创立的“过去时间的抚养费不受追索”规则被不少民法典采用。以下按颁布时间先后顺序介绍各民法典对该规则的采用情况。

1889 年的《西班牙民法典》第 148 条第 1 款规定：从扶养权利人需要扶养以便生存之时起，提供扶养的义务开始可以请求；但扶养权利人不会得到起诉之日前的抚养费。此条明确告诉我们：扶养义务的履行需要激活，起诉请求抚养费者只能得到未来时间的抚养费；换言之，过去时间的抚养费不能追索。按此条，“过去的时间”就是起诉前的时间，也就是指激活扶养义务之前的时间。当然，起诉费时费钱，非起诉不能让抚养费到期，对权利人的要求太高，所以，从《西班牙民法典》派生的《菲律宾民法典》在这一点上有所改进（详见后文）。

1896 年的《德国民法典》第 1613 条的条名就是“过去时间的扶养”，其第 1 款规定：权利人只有在为实现扶养请求权的目的通知自义务人答复关于其收入和财产的询问，使义务人陷于迟延或扶养请求权处在诉讼系属时起，才可请求履行过去时间的抚养费或诉求不履行的损害赔偿。扶养请求权确实在此时已存在的，抚养费自上述事件发生之月的第一日起起算。该款采用“只有……才可”的句式，表明过去时间的扶

养费原则上不可主张，权利人只有做了本款要求的三件事之一时，才可作为例外主张之。其一，正式询问了义务人的收入和财产状况，并要求答复，以此表明权利人有受扶养的需要，然后看义务人有无履行此等义务的可能；其二，使义务人陷入迟延。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按《德国民法典》第 286 条（条名“债务人迟延”）的规定，权利人实施履行催告或送达督促程序中的支付令的，可以使债务人陷入迟延。这两个举措表明权利人需要扶养了，义务人不响应扶养要求的，就陷入了迟延；其三，扶养请求权处在诉讼系属，也就是义务人的扶养问题正由法院处理中，之所以如此，可能是义务人自己起诉的结果，也可能是他人起诉的结果，例如，他人看义务人无人扶养活不下去，提起打抱不平诉讼。做完这三件事之一后，权利人有两个选择。其一是诉追过去时间的扶养费，但这样做要符合两个条件。第一，权利人在做完上述三件事情之一时，他的扶养请求权还存在，例如，如果他对义务人实施了法律列举的忘恩负义行为，他的此等权利就不复存在。第二，如果他的扶养请求权还存在，他也只能主张有限的过去时间的扶养费，因为此款明定从他做完法律要求之事到请求（其实就是起诉）之间的期间，他只能请求从做完法律要求之事之月的第一天开始起到起诉日之间期间的扶养费。假设扶养关系的确立时间是 1968 年 5 月 8 日，权利人提出催告的时间是 1978 年 6 月 9 日，起诉义务人的时间是 1978 年 12 月 20 日，权利人可请求的只是从 1978 年 6 月 1 日到 1978 年 12 月 1 日期间的过去时间的扶养费，而非从 1968 年 5 月 1 日到 1978 年 12 月 1 日的期间的过去时间的扶养费，所以说，权利人只能主张有限的过去时间的扶养费。其二是诉追过去不履行扶养义务的损害赔偿。扶养债权因为履行不能而消灭，但如果此等不能归责于义务人（例如，变更了地址而未通知权利人）或第三人（例如，他给义务人带来了财产损失致使后者无履行能力），则产生损害赔偿债权取代扶养债权。请注意，不履行扶养义务的损害赔偿责任人可能是扶养义务人，

也可能是第三人。赔偿金的数额也不见得与应付的抚养费数额相等，例如，在不履行扶养义务既有义务人的责任，也有权利人的责任（例如，他未尽一切努力寻找义务人的新地址）的情形。所以，不可把不履行扶养义务的损害赔偿金看作抚养金的替代。

第 1613 条第 2 款规定，在以下情形，权利人可以不受第 1 款规定的限制：1. 因不定期的异常高的需要（特别需要）而请求履行过去时间的抚养费；但自请求权发生时起经过 1 年后，仅在此前义务人已陷入迟延或扶养请求权已在诉讼系属中时，才能主张该项请求权。2. 对于 a) 权利人由于法律上的原因不能主张扶养请求权的时段，请求履行过去时间的抚养费；b) 由于属于扶养义务人责任范围内的事实上原因不能主张抚养费请求权的时段，请求履行过去时间的抚养费。此款为第 1 款所定规则的但书，其第 1 项规定了扶养权利人“特别需要”的例外，此等需要的例子是医疗费、修学旅行费用等。但这种例外是有限的，“特别需要”发生后的 1 年内权利人必须对扶养义务人采取第 1 款规定的措施，否则其请求权也消灭。所以，对于权利人的“特别需要”请求权，立法者安排了一年的时效以保护义务人。第 2 项分别规定权利人和义务人方面的原因阻碍行使抚养费请求权的，原因消失后可主张过去时间的抚养费。权利人方面的法律上原因，例如，亲属关系尚未通过 DNA 检测确定。义务人责任范围内的事实上原因，例如，被判刑入狱。

第 1613 条第 3 款规定：在第 2 款第 2 项规定的情形，如果全部履行或立即履行会给义务人带来有失公平的苛刻，不得请求履行，只能请求分期履行或在日后的某一时点履行。在第三人因已代替义务人给付抚养费而向义务人请求补偿的情形，也适用前句的规定。此款显然是第 2 款第 2 项的但书，主要考虑行使请求权的障碍消除后突然对义务人行使累计的多期次请求权产生的冲击，义务人受不了此等冲击的，可改为分期履行或押后履行。顺便规定了第三人代为履行扶养义务的合法性，这就意味着权

利人在向义务人提出请求权前可以向他人借款或向公共机构请求救济以满足自己的紧迫需要，当他“激活”了义务人的扶养义务后，此等借款人或公共机构可向义务人报销自己已为的给付，当此等第三人一股脑地向义务人追偿自己多期次履行对后者产生冲击时，义务人可以请求分期履行或在日后的某一时点履行。总之，《德国民法典》对过去时间的扶养费的追索问题作了无比明确的规定。设定了不得追索的原则，又设立了若干例外，还规定了对拖欠的扶养费的处理。既考虑了权利人的利益，也考虑了义务人的利益。可谓典范。

1942 年的《意大利民法典》第 445 条（条名“扶养的开始”）规定：扶养义务自提出司法请求之日成立。如果义务人构成迟延，权利人在此等迟延后的 6 个月内提出了司法请求，则扶养义务自构成迟延之日起成立。此条中的“提出司法请求”即在《意大利民法典》第 2948 条规定的 5 年的诉讼时效期间内起诉义务人，换言之，权利人走诉讼程序主张自己的受扶养权。“构成迟延”，按《意大利民法典》第 1219 条的规定，即权利人通知或书面请求义务人履行扶养义务，换言之，权利人走非诉讼程序主张自己的受扶养权，这种选择当然比较经济。起诉或催告，都是权利人对自己需要扶养的自证，都导致义务人扶养义务的“激活”，所以，起诉日即扶养义务成立日或曰誕生日，后一说法为《意大利民法典》第 445 条的评注者卡尔罗·阿里基罗非（Carlo Argiroffi）所采。在权利人催告的情形，义务人不见得都听从此等催告，权利人在催告后的 6 个月内提起了诉讼的，催告日即为扶养义务成立日。从催告日到起诉日之间的过去时间的扶养费，可以追索。在我看来，本条的安排对于权利人还是负担太重：催告本身不足以使扶养义务成立，还要加上起诉才能如此，而起诉必须跑法院，找律师，这些对于所有人都不是件容易的事。之所以课加权利人起诉的负担，是为了防止扶养义务人受到权利人的投机行为的威胁。申言之，权利人在催告义务人支付扶养费

后,好几年后才向法院起诉主张权利,同时,要求以他的催告时间为起点计算抚养费,这样,义务人要支付的抚养费就要多许多。设立了 6 个月的起诉期限后,起诉的溯及力只有 6 个月,义务人要支付的过去时间的抚养费就少多了。实际上,6 个月的起诉期限是保护义务人的一个措施。这样的安排,可描述为“过去时间的抚养费可有限(6 个月)追索”,而且,此等追索并不受《德国民法典》第 1613 条第 1 款规定的诸多条件的限制。

读了上述第 445 条,易让人产生这样的疑问:未成年子女请求其父或母抚养,难道还要走起诉或催告的途径?这个条文的德译本把本条中的“抚养”译成“限制性抚养”(eingeschränkte Unterhalt),即权利人有需要、义务人有可能才会发生的抚养,它是强化的抚养(gesteigerte Unterhalt)的对反,这种抚养发生于父母与其未成年子女之间,具有无条件性。按《意大利民法典》的德译者的这种解释,第 445 条只适用于我国术语意义上的抚养和赡养。这两种“养”的权利主体都是成年人,通常都有自己的收入,需要被人“养”,确实必须把自己的需求以规定的两种方式让义务人知晓,而生活保持关系中的权利人由于无劳动能力,总是需要“养”的,此等需要无需以意思表示传达。当然,如果是母亲监护子女,父亲提供抚养费的情形,假设母亲富有,不用父亲的抚养费子女也能得到需要的一切,但这不是豁免父亲的抚养义务的理由,而是证明父亲不当得利的证据。总之,《意大利民法典》的德译者的解释性翻译提示我们,“过去时间的抚养费不受追索”可能通常不适用于生活保持义务关系。说“通常”,乃因为如果义务人入狱服刑,人身失去自由,不能取得任何收入,可能构成例外。

或问,在抚养和赡养的情形,在权利人催告或起诉前,已借债或从公共援助机构取得资助满足自己的生活需要的,他们起诉或催告成功后,可否要求义务人报销此等

借款或向公共援助机构还款？意大利立法机构在制定上述第 445 条时考虑过这一问题并倾向于应报销或还款，由此主张判给抚养费的判决可以具有追溯效力，这也是《德国民法典》第 1613 条第 3 款第 2 句的处理，但此等处理未被采纳，理由是如此安排，会鼓励发展出一套利用扶养权利人的需要剥削扶养义务人的经济能力的信贷体系。此语拗口，我理解，其含义是防止权利人“不走大路走小路”，给义务人带来额外的负担。“大路”，即催告或起诉义务人；“小路”，即撇开催告或起诉义务人直接找放高利贷者；“额外的负担”，即让义务人承担本金以外的高额利息。

1950 年的《菲律宾民法典》第 298 条第 1 款规定：自有权接受扶养的人为维持生活需要抚养费时起，给予扶养的义务可请求，但是，自司法外请求之日起，扶养费用才应被支付。与前引《西班牙民法典》第 148 条第 1 款相比，此款考虑到打官司难、费钱，故不以诉讼请求作为“激活”扶养义务的手段，而是以司法外请求为此等手段，这样的请求可通过可留下证据的通讯方式实施，例如，写信、发电子邮件、录音了的电话等。

1964 年的《葡萄牙民法典》第 2006 条规定：自有关诉讼提起时起即须提供扶养，如已由法院或透过协议定出所提供之扶养，则自扶养义务人迟延给付时起即须提供扶养，但不影响第 2273 条规定之适用。按照此条，扶养义务必须通过权利人的起诉“激活”。如果法院判处了或权利人和义务人约定了抚养费，也不自动生效，需要权利人提出催告让义务人陷入迟延后才生效，但若权利人对义务人实施了第 2273 条规定的要导致褫夺继承权的行为，则作罢论。整条的安排都让权利人处在吃嗟来之食的屈辱地位。

1994 年的《魁北克民法典》第 595 条规定：1. 对为申请前 1 年前就存在的需要，可以主张抚养费。2. 扶养权利人应证明他事实上无法在更早时间主张，他已在为申请

前 1 年内向扶养义务人提出要求的除外，在此等情形，授予自提出要求之日起算的扶养费。此条第 1 款允许追索过去时间的扶养费，但以过去的时间在一年内为限，这样的安排，比《意大利民法典》第 445 条只允许追索过去半年时间的扶养费宽容。第 2 款规定：权利人为了取得第 1 款规定的溯及性的扶养费，必须证明他无法在更早的时间提出主张。此时的“主张”，应是诉讼主张。如果未提出此等诉讼主张，向义务人提出了非诉讼的“请求”的，权利人也可取得溯及性的扶养费。所以，第 595 条尽管未明言过去时间的扶养费不可追索，但一直依据这个规则行文，紧紧地控制这一规则的例外的范围。

2010 年的《加泰罗尼亚民法典》第 237-5 条第 1 款规定：人在需要时享有受扶养权，但不能追索在通过司法或法外程序提出请求之前的扶养费。此款的精神与前述《菲律宾民法典》第 298 条第 1 款的精神一致，都允许以比较简单的方式“激活”扶养关系，不许权利人要求“激活”之前的扶养费。

2014 年的《阿根廷国家民商法典》第 548 条（条名“判决的追溯力”）规定：扶养费自起诉之日起或自债务人以可靠方式提出催告之日起算，前提是起诉是在催告以后的 6 个月内提起的。此条允许权利人以诉讼和非诉讼两种方式“激活”扶养义务，可以先非诉讼“激活”，如果“激活”不了，则可诉讼“激活”，但须在非诉讼“激活”后的 6 个月内进行，否则“激活”受挫。至于“激活”前的扶养费，不可追索。为何两个“激活”行为的时间间隔是 6 个月？可参见前文关于《意大利民法典》第 445 条的说明。

以上是比较明显地体现了“过去时间的扶养费不受追索”原则的民法典的规定，属于不完全列举。未被列举的民法典不见得采取另外的立场，因为不“激活”而让义务人在扶养关系成立始就履行扶养义务，如同我在本文第一节以假设案例证明的，违

反了扶养关系的本质，让义务人无谓牺牲，让权利人不当得利。有些民法典未做出关于过去时间的扶养费的专门规定，是因为宜粗不宜细的立法风格所致，这种风格的立法抓大放小，扶养义务的“激活”问题可能被作为“小”省掉了。其民法典未做出“激活”规定的国家和地区其学说和实务不见得不这样做，下文就要讲到这方面的例子。

四、我国法上扶养义务的“激活”与过去时间的扶养费问题辨析

在我国三部学者主持起草的民法典草案中，只有王利明教授团队的草案比较直接地触及扶养义务的“激活”问题。其第 513 条第 1 款规定：自扶养权利人提出请求时起，扶养义务人负担扶养的义务。此款揭示了扶养义务并不自动生效，需要权利人“激活”的国际通行规则。尽管未被《民法典》采用，王利明教授团队的上述规定证明我国学界对一个流行于如此多的国家和地区的合理规则并非无知，故功不可没。惜乎没有规定对过去时间的扶养费的处理。

在实务上，我国也有采用过去时间的扶养费不受追索规则的判例。比如，2016 年在中国法院网就登载了如下案例：肖某和李某于 1993 年 12 月登记结婚。1995 年 2 月，两人生育女儿小肖某。婚后，夫妻两人因生活琐事长期争吵，2000 年 3 月，妻子带女儿回娘家居住。从此，小肖某的一切费用均由其母承担，其父未再支付任何费用。2016 年，小肖某向人民法院起诉要求其父支付其应当承担的小肖某未成年期间实际产生的抚养费 30 万元。人民法院未予支持，理由是小肖某的扶养请求权已罹于时效。法官认为，在抚养法律关系存续期间，给付抚养费请求权不应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但在抚养法律关系不再存续的情形下，此等请求权应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例如，权利人满 18 岁以后再要求其 18 岁以前的抚养费的，则应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

本案中在小肖某在起诉时已 21 岁。按在 2016 年的仍然有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通则》（以下简称《民法通则》）第 135 条的规定，普通时效期间为两年，显然，小肖某超过了时效期间 1 年起诉，所以，尽管其父肖某在其未成年期间未尽抚养义务，但小肖某已失去了要求给付抚养费的被抚养人身份，因此，其诉讼请求不应当得到保护。在我看来，对本案可进行另外的解释。2016 年小肖某起诉乃父要求其履行扶养义务，此等起诉的法律意义是“激活”，但“激活”得不是时候，因为正如其案件的主审法官所言，她满 18 岁后就不具备“激活”的资格了，因为“激活”的目的是谋求未来时间的抚养费，乃父为其 18 岁后就对其无扶养义务了。而且，“激活”还受到时效的限制，《民法通则》规定的普通诉讼时效是 2 年，小肖某超过 1 年行使诉权，此等权利已罹于时效。尽管如此，小肖某的“激活”还是具有时间坐标的意义，在本案中，从 1995 年小肖某出生到 2016 年起诉的 21 年的抚养费，谓之“过去时间的抚养费”。请读者注意，这里我不是把从遭遇困境到起诉（“激活”扶养义务的一种方式）的时间算作“过去的时间”，而是以小肖某的出生时间为“过去的时间”的端点，不同于我在本文第一节考察子女扶养父母关系中采用的以“困境”的发生在“过去时间”的端点的方式，此乃因为两种扶养关系性质不同，小肖某所处的为生活保持关系，生活保持义务人在权利人无困境时也要给付抚养费。小肖某及其为成年时期的法定代理人李某未在 2016 年之前起诉李某履行扶养义务，表明李某的经济条件好，可垫付肖某应付的抚养费，人民法院不支持小肖某的 30 万元过去时间的抚养费，过于绝对。如果能追加李某为第三人，让她对肖某提出不当得利之诉，则可能更为正确。

五、结论

哥尔迪安的敕答开创了过去时间的扶养费的法律地位问题，将之降等，允许其成为和解的对象。魏多弗雷多把这一问题改造成时间错位问题，形成不诉追过去时间的扶养费构成不需要此等经济支持的表面证据的推理，以此保护扶养义务人并鼓励权利人自力更生。波坦诺明确提出了过去时间的扶养费不受追诉的原则，被许多现代民法典采用，本文证明至少有 10 部民法典采用了这一规则。其中，《德国民法典》对这一问题作了最明确细致的规定，它原则不许追索过去时间的扶养费，但允许一定的例外。《意大利民法典》的德译者把父母与其未成年子女的生活保持关系排除作为过去时间的扶养费不受追索的适用对象，强调了抚养与扶养、赡养的不同，甚有道理。我国的王利明团队民法典草案也采用了这一规则。

有了这些作为基础，首先，我国应通过司法解释确立过去时间的扶养费不可无限追索的规则。在这样做时，我们先要破除扶养义务人都是“大款”的假定，并确立义务人的财产状况变动不居的观念，向坏的方向变动的原因之一的是服刑。这些人通常都随着入狱丧失扶养能力，硬要他们履行扶养义务，无异于缘木求鱼。对他们过去时间的扶养费甚至生活保持费实施无限追索，也影响他们回归社会，甚至诱发重新犯罪。

其次，要确立禁反言原则作为过去时间的扶养费不受追索规则基础。所谓禁反言，是在法律关系中，若一方当事人实施的行为导致对方当事人产生了合理信赖，此等当事人不得实施与先前行为矛盾的行为，否则将承担法律规定的一定后果的原则。义务人长期不行使扶养请求权，导致权利人产生了他们已放弃此等权利的确信，然后突然行使此等请求权的，构成违反禁反言原则，有伤相对人的信赖，法律应不保护之。

最后，建议适当借鉴德国民法典的相关规则作出司法解释，即不要求把起诉作为“激活”扶养义务的手段，以减轻权利人和人民法院的负担。以“催告”“激活”扶养义务，足矣！另外，权利人找不到义务人履行扶养义务的，如果有第三人代养或权

利人贷款解决生活需要，应允许此等第三人或贷款人向义务人主张报销。